

中國近代文教趨勢與《水滸傳》的商業出版 (1919-1949)

郭璉謙*

摘要

鉛、石印技術滿足通俗小說市場需求，而待 1919 年起，因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及整理國故、學校及民眾教育等文教趨勢登上時代舞台，促使《水滸傳》文本面貌趨向多元，出現前所未見的出版方式：先是採用新式標點的亞東本《水滸》刪除金批語，讓多家出版社追摹仿效；接著白話文運動發酵，成為白話文範；而學校教育納入語體文，在兒童語體文讀本不足之下，教員已率先採用片斷故事本作為閱讀教材；中小學國文課程綱要的「略讀」部分，則孳生片斷故事本及原著新訂本，更徹底執行整理國故，刪汰淫褻、神怪、暴力等國渣，以適合兒童、青少年及民眾閱讀。總之，《水滸傳》隨著文教趨勢，從「通俗小說」搖身一變，轉型成為賦予語文教育的「國學經典」，各大書局爭相出版，商品性格顯露無遺。

關鍵詞：《水滸傳》、白話文運動、整理國故、教育政策、出版文化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一、前言：「致富奇書」的古本新印

鄭光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印的《一斑錄》中載：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切歎風俗繫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心之情慾，誘為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襲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¹

文中固然厲斥《紅樓夢》等書為誘人不軌的惡劣小說，但同時表明這些小說為「致富奇書」，即今日所言的「暢銷書」。其時，金聖歎批本七十回《水滸傳》（以下簡稱金本《水滸》）已流行天下，鄭光祖所提到的《水滸傳》，即是此版本。金本流行後，百二十回本餘後的四十九回則割裂成《征四寇》；而《漢宋奇書》（又名《英雄譜》）則收有百十回本及百一十五回本。² 直到清末，《漢宋奇書》刊印不絕，可

¹ 〔清〕鄭光祖，《一斑錄》，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2003年），雜述四，〈銷書可慨〉，頁9b-10a。

² 明崇禎年間，熊飛雄飛館刊梓《英雄譜》，書衣右行直書「名公批點合刻三國水滸全傳」，現存圖贊已佚的初刻本及圖贊尚存的二刻本；所收《水滸》為百十回，屬於繁簡綜合本（見馬蹄疾，《水滸書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03-104）。《漢宋奇書》收百一十五回本，上田望調查計有18種版本（〈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版本目錄（稿）〉，《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4號，1998年，頁11-12），當可再補入三種版本：近文堂重刊興賢堂本（見馬蹄疾：《水滸書錄》，頁33）、芸香堂刻本及芸生堂刻本（皆見王清源、牟仁隆、韓錫鐸編纂，《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4月，頁73及頁225）。氏岡真士將日本佐賀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金陵文元堂梓行《英雄譜》二十卷（以下稱佐賀本）與《漢宋奇書》本比較，指出用「金聖嘆」之名的《漢宋奇書》，當在乾隆年間才出現（〈《征四寇》溯源〉，《人文科學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第46號，2012年3月，頁50-63）。順帶一提，馬蹄疾據聶紺弩〈論《水滸》的繁本和簡本〉引錄一部《文元堂刻英雄譜本忠義水滸傳》（《水滸書錄》，頁31-32）。其實，這一部書與佐

見市場魅力；但清末時，石印技術隆盛，目前所見書目，居然未見任何一部《漢宋奇書》石印本，頗令人匪夷所思。

到了清末民國初，石、鉛印技術昌盛，更有助於金本《水滸》流通書肆。³ 特別是石印術，1876 年以後，在十里洋場上海廣為流行，僅上海一地，石印書局高達 90 家以上。利用蒸汽機石印法的現代科技，革新雕版印刷的不便，提高印刷速度及產量，若與照相石印法相配合，能夠縮印傳統書籍，且文字原形，絲毫不差。最重要的是，印

賀本《英雄譜》相同，只是馬蹄疾據聶紺弩文章載錄時，都錯同樣一個地方，即署題當作「聖德堂識」之「聖」誤作為「聚」。

³ 此外，清末文教趨勢與《水滸傳》的商業出版亦不容忽視。清末以來，隨著梁啟超登高一呼「小說界革命」，創辦《新小說》、發表《新中國未來記》，結合理論與實踐，導入啟發民智、改良社會、經國濟世的使命，引發日後「新小說」創作熱潮，並扭轉「小說」觀念，提升其地位，達到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9 月）中所言「從文學結構的邊緣向中心移動」（頁 14），且因小說市場的建立及作家的專業化，具有「商品化傾向」（頁 83-91）。然而，小說雖因肯定其社會功能而獲得重視，時人仍存有視小說為小道的矛盾觀點，甚至否認舊小說的價值，如梁啟超不只一次批評舊小說為「誨淫誨盜」之作。為此，嚴復、夏曾佑曾指出「誨淫誨盜」之說，蓋因後人不擅解讀舊小說中深隱難求之旨所造成，於是有王鍾麒等人提出「善讀」舊小說，據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 2 月）研究，乃以期「給予傳統小說新的生命、並產生足夠的威勢，以掃除時人對舊小說的鄙視，而給予重新評價」（頁 175）。以《水滸傳》為例，即有燕南尚生結合社會、政治功能的《新評水滸傳》（1908），1912 年之後還有鄧狂言《水滸索隱》（1929）、樾公《水滸傳索隱》（1931）問世。除了「善讀」之外，還有今日視為續擬之作而昔日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5 月）用來指稱「襲用舊的書名與人名，而寫新的事」（頁 269）的「擬舊小說」，也往往導入社會功能、政治局勢，亦能扭轉對舊小說的觀感。總體觀之，清末以來「小說界革命」實為對舊小說影響甚鉅的文教趨勢，梁啟超利用革命誨淫誨盜的舊小說，創作改良群治的新小說，故所謂小說地位的提升，並非新、舊小說一步到位，而是從新小說逐步蔓延至舊小說（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及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的研究成果，讓讀者產生小說地位的提升是從新小說逐步蔓延至新小說的感覺）。獲得社會各階層高度認同的舊小說，已無憂呼吁禁毀，且為出版界奠定社會心理基礎，構成大量傳印小說的助力，此亦為《水滸傳》等舊小說能夠大行其道的主因。對於清末文教趨勢與《水滸傳》的商業出版之議題，以上僅略抒己見，尚待精研細論，容後另行撰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該議題的提醒。

書能獲巨利，科舉用書自不必多言，甲午戰敗至 1905 年間，許多石印書局看準中國為追求西學新知的商機，將相關著譯匯集成叢書出版；此外，為迎合市井趣味，亦有大量通俗小說、畫報及連環畫出版。

⁴ 總之，石印術降低書籍出版成本，「使書籍愈加商品化，得到更廣泛的傳播」⁵。據本文統計，從光緒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書局石印金本《水滸》算起，至 1930 年，至少有 27 部石印本。⁶

除了石印本外，未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鉛印本亦為數不少，至少有 12 部。鉛印技術並不晚於石印技術傳入中國，但由於要鑄造完成一副中文字模耗工費時，且排字檢字不易，故出版社多使用簡便易行且效率極高的石印法；而鉛印技術主要是傳教士在使用。⁷ 若一旦解決中文鉛字製造進程及增快排字檢字速度，由於鉛印本字距齊整，佔有閱讀舒適度優勢，未若石印本字距麻密，當讀者習慣鉛印本，石印本則遭市場淘汰。因此，儘管 1911 年至 1930 年間，石印、鉛印本各

⁴ 關於石印術在華傳播史，已累積豐厚研究成果，不再贅述，詳參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中國印刷史料選輯》第 4 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年 9 月，頁 358-367；韓琦，〈晚清西方印刷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石印術的傳入為例〉，收入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2 月，頁 114-127；及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收入上海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2 月，頁 23-26。石印工藝介紹可參見范慕韓主編，《中國印刷近代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 年 11 月），頁 564-567。

⁵ 韓琦，〈晚清西方印刷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石印術的傳入為例〉，收入《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頁 125。

⁶ 該統計據馬蹄疾編著《水滸書錄》、王清源、牟仁隆、韓錫鐸編纂《小說書坊錄》及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 11 月）等目錄，結合筆者蒐集而得。下文鉛印本統計亦是如此。

⁷ 范慕韓主編，《中國印刷近代史》，頁 546 及頁 549。另可詳參韓琦，〈從澳門、香港到上海——19 世紀中葉西方活字印刷技術在中國的傳播〉，收入上海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頁 141-151，該文強調活字數量減少和有效利用、排字的簡單化及鑄字技術的改進，促進活字印刷的傳播。

擅其場，但在市場機制淘選下，石印本實際上已式微。

在條件相同狀況下，出版商為吸引讀者擇購，於是需打廣告，以石印本為例，都附有繪圖，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書局石印本加入潘金蓮、潘巧雲、閻惜嬌等人物繡像，以「投合當時市民階級的低級趣味」⁸；亦可見民國間文盛書局石印本在書套題簽，標明「改良彩像」⁹；或見敦璣好齋石印本襲用笑仙逸史（生平不詳）插圖一百四十二圖，並在圖端題廣告云「精繪全圖：書凡七十一回，連引首楔子合共在內；圖都百四十二幀，每回上下句分繪兩圖」¹⁰。更有甚者，趙景深藏一部清光緒間坊間石印重刊句曲外史序本，圖兼收杜堇《水滸全圖》五十四幅及笑仙逸史插圖一百四十二幅。¹¹除了以圖吸引讀者目光之外，也有如民國間上海鴻章書局石印本，乃「坊間所行之本，亦非一種，而訛誤輒不免焉。本局特覓得精本，□加校勘，以饗讀者」¹²，強調版本精良，校對精細。蒸汽機運轉的石印技術，讓書籍出版步入現代化，且越加商品化；但廣告方面，基本上一仍其舊，從繪圖及校勘著手。

另外，觀察該時期出版狀況不可忽略的是依用紙、裝幀及字體大小而有價錢之分。書籍用紙分連史紙（中紙，甲種）及有光紙（洋紙，乙種），前者比後者貴，如上海掃葉山房書目《大字足本評註水滸全傳》廣告中，全書精訂十二冊兩函，連史紙要價四元，有光紙則二元六角。¹³若再細分則將裝訂方式細分洋裝（精裝）及平裝，前者又貴於後者，如《大字增評詳註聊齋誌異》售價分成「特種洋裝二厚冊大

⁸ 馬蹄疾，《水滸書錄》，頁131。

⁹ 同前註，頁136。

¹⁰ 同前註，頁133。

¹¹ 同前註，頁129-130。

¹² 鴻章書局主人，〈水滸傳序〉，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137。

¹³ 掃葉山房主人，《掃葉山房書目》，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2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9月），頁265。

洋四元八角/甲種連史紙精印大洋四元/乙種有光紙精印大洋二元六角」¹⁴ 三種。又有大字本及小字本，如上海章福記書局在民國十年（1921）重訂圖書目錄中，《繪圖五才子水滸傳》即分成大字本及小字本，¹⁵ 大字本定價又較小字本高些。由上分析顯示，同一部書，出版社有時會規畫出二至三種標價，如上海江東茂記書局標「大字足本全圖五才子二套 一元五角」、「五才子水滸傳 四角」¹⁶，以供讀者依照消費能力選購。因此，實際出版量，當遠勝於本文開頭的統計。

石、鉛印技術雖然只是古本新印，卻革新雕版印刷，讓生產方式步入現代化，非但出版速度快捷，連書籍價格更為便宜。但這僅為《水滸傳》邁出商品化與現代化的第一步，隨著時代變遷，《水滸傳》不再於「古本新印」裹足不前，而是受文教趨勢左右，逐漸演化出各種書籍商品，以滿足讀者所需——確切地說，是為了符合市場機制。

緣於此，本文試圖剖析在石、鉛印技術後爆量發行的《水滸傳》，為了符合文教趨勢所成形的市場機制，有哪些原貌會退出文本，又激盪出何種文本面貌？本文將分成二方面討論此轉變過程：（一）、從《水滸傳》原著出發，以新式標點符號、白話文運動及整理國故等文教趨勢，觀察新式標點本及改良本（原著新訂本及片斷故事本）的產製過程。（二）、結合教育部對國文課程標準所擬訂的「略讀」方針，以及眾多出版社編印的教育叢書，探討《水滸傳》由「通俗小說」朝向賦予語文教育的「國學經典」。本文將時間斷限周旋於民國八年（1919）至三十八年（1949），理由在於上述文教趨勢於1919以後陸續登場；1949年之後，海峽兩岸分治，雙方雖有陸續出版《水滸傳》，因掌握資料不足，不予細論。

¹⁴ 同前註，頁263。

¹⁵ 同前註，頁385。

¹⁶ 江東茂記書局編，《江東茂記書局圖書目錄》，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11冊，頁671、674。

二、告別金聖歎：「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

鉛印本排版形式主要有四種（見附錄一），圖一是最早的鉛印本排版形式，排版如同古籍，採線裝，有函套，但一部作品往往高達 8 至 12 冊。圖二是改良後的形式，字體或為細明體、或為仿宋體，即使行距密麻，仍能保持字體清晰；因受到洋裝本影響，已脫離線裝形式，採用今日所謂的膠裝，裝幀方式又可分平裝及精裝兩種，可整併冊數，精簡篇幅。圖一及圖二僅在行右採「。」或「·」作為標點符號；而圖三字體為細明體，用的是「新式標點符號」，但放在行右。之後，排版方式進化，標點符號化入行中，沿用至今，則成圖四。

新式標點符號屬泰西文明，咸豐十年（1860），同文館學生張德彝於《再述奇》已介紹了泰西各國九種標點符號的用法。儘管自清末起，已陸續有介紹和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文章出現，但並沒有引起討論及重視；這種狀況，直到 1916 年起，胡適發表〈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及《新青年》開展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討論，才漸有改觀。經由胡適、魯迅、陳望道、錢玄同等學者、文人的推動及議論之下，1919 年時，已陸續有雜誌刊物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只是使用狀況各自表述，尚未統一，仍顯紛亂。1919 年 4 月，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決議通過胡適、馬裕藻、周作人等六人所提交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1920 年 2 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該議案，發布第 53 號訓令〈通令採用標點符號文〉；自此，新式標點符號方有統一規範。¹⁷ 胡適等人所提議的新式標點符號是用西洋最通行的標點符號，並斟酌中國文字的需要，共擬出十二種，可解除沒有標點符號「平常人不能『斷句』，書報便都成無用，教育便不能普及」、「意思有時不能明

¹⁷ 關於清末至 1920 年間，新式標點符號的演進、討論及爭議，可參考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頁 281-349。

白表示，容易使人誤解」及「決不能教授文法」等三大弊處。¹⁸

第一部採用新式標點符號出版的古籍，是 1920 年 8 月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水滸》（以下簡稱亞東本），由汪原放對金本進行句讀，以同文書局的石印本作為圈點本、商務鉛印本作為校對本。¹⁹ 書前有胡適所撰長文〈《水滸傳》考證〉，開頭即云：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的多。²⁰

亞東本的出版時機，正好適逢教育部頒行使用新式標點符號，且當時通俗小說不是密密麻麻的石印本，就是以「。」或「·」作為標點符號的鉛印本，亞東本搶得先機，進行一項當時出版界不欲為、不敢為或不可為的革新，其最大的功勞在於作為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來句讀古籍的示範本。

亞東本進行一項最大膽的嘗試——刪除金聖嘆批語，胡適認為「這種機械的文評正是八股選家的流毒，讀了不但沒有益處，而且養成一種八股式的文學觀念，是很有害的」，並稱許亞東本的長處即在於「把文法的結構與章法的分段來代替那八股選家的機械的批評」，刪去夾注使文章連成一片，不致於中斷，讓「讀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聲口和插入的氣話；自然覺得這是很能摹神的敘事；並且覺得這是

¹⁸ 胡適，〈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101-102。

¹⁹ 汪原放，〈水滸校讀後記〉，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 144。

²⁰ 胡適，〈《水滸傳》考證〉，《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實業印書館，1934 年 1 月），頁 1。

敘事應有的句法」²¹。實際上，汪原放當時考慮刪除金聖嘆的眉批夾注時，其叔汪孟鄒提出「把金聖歎的眉批夾注一概刪掉，妥當不妥當？」、「幾百頁的大書，不是好玩的，凶險哩！賣不掉，老本虧掉，不得了！」²²等疑慮，可見當時讀者已將金批語視為書本的一部分，因此汪孟鄒以商業考量給予建議。所幸，胡適將金批語視為八股文遺毒批駁一番，當時社會又期待新文學（白話文）降臨，非但未造成滯銷，反而頗獲讀者青睞，初版原預備印二千部，臨上時決定加到五千部，一年後再版；²³ 1922 年，亞東圖書館十周年紀念時，已印了四版共一萬四千部。²⁴就意義而言，金聖嘆開啟了中國日後三百年閱讀金本《水滸》，包含其評點，但汪原放進行新式標點時，將評點大筆一刪，使金聖嘆的評點，從此退出文本。

亞東本刪去金批語，做為新式標點符號範本，市場反應極好，從而影響其他書商群起尤效。晚於亞東本出版的《水滸》新式標點本中，或直接或間接地指出金聖嘆的評語是八股遺毒，如三民公司排印《水滸傳》（1930），周瘦鵑作序云：

今三民公司用新式標點印行此書，刪去金聖嘆之評語，一存其真。蓋金聖嘆之評，多迂腐臆斷之說，固不若由讀者直接研究之為愈也。²⁵

李逸侯為新文化書店的《水滸》（1930）撰序時也提到：

至如這部《水滸》的文字是怎樣的好，它的文字裡面又蘊藏著什麼主義。這些問題，我以為留待讀者自己去研究，才有興味，

²¹ 同前註，頁 3-4。

²²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 年 2 月），頁 59。

²³ 同前註，頁 65。

²⁴ 吉少甫，〈亞東圖書館的盛衰〉，收入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頁 247。

²⁵ 周瘦鵑，〈水滸傳序〉，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 156。

故不置論。新文化書社現在翻印這部《水滸》，把歷來各家對於《水滸》的眉批評語，一律刪去不刊，也就是這個意思。²⁶

皆可視為亞東本的嫡系子弟。當時即有人觀察到「自從汪原放標點了《紅樓夢》、《水滸》，為書賈大開了一個方便之門，於是一些書店掌櫃及夥計們大投其機，忙著從故紙堆裏搬出各式各樣的書，都給牠改頭換面，標點出來，賣之四方，樂得名利雙收」²⁷。自此以後，各書局採用新式標點的《水滸傳》陸續出版，即連水滸續書，甚至其餘古典文學作品，不論文言或白話，紛紛加入新式標點的行列。連帶的，廣告宣傳也有所改變，以往強調「繪圖增像」，但這些圖像在改用新式標點符號後一併慘遭拆除，在眾家均不重視繪圖繡像情況下，「新式標點符號」成為廣告噱頭，如上海掃葉山房在民國十八年（1929）重訂的圖書目錄中即有一篇〈新式標點緣起〉短文，後列出 40 部採用新式標點的古籍，²⁸ 而如《新式標點晏子春秋》廣告云「本局特加新式標點而附其註於篇後，以便讀者節省目力，減除翻閱」²⁹，《新式標點東萊博議》廣告云「本局為讀者便利起見，凡本文及註解概用新式標點，新舊陶鎔，古今混合于此一書」³⁰。但另一方面，舊式標點仍然並存，在《大字足本評註水滸全傳》廣告（見附錄二）云：

近自提倡白話文字，此書價值益增，然坊刻雖多，類皆效顰西施；強加標點，與書中之大旨無關。而板本之精善者，轉覺希

²⁶ 李逸侯，〈水滸新序〉，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 165。

²⁷ 育熙，〈示眾〉，《語絲》第 4 卷第 16 期（1928 年 4 月 16 日），頁 21。

²⁸ 掃葉山房主人，《掃葉山房書目》，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 23 冊，頁 235。

²⁹ 同前註，頁 284。

³⁰ 同前註，頁 285。

見。本號有鑑於此，特繕大字精本，增繪圖像，兼加評註。³¹

廣告重點放在白話文並強調板本精善、大字評註，可視為對市場充斥惡劣新式標點本的反響。

汪原放在一封寫給魏紹昌的信中，曾回憶當時「亞東本舊小說出版後，受到歡迎，做這種校點、整理古書、小說的人和書店，接二連三的增加起來，有的是把亞東本拿去改頭換面、翻印出版，有的粗制濫造，薄利多銷，為了賺錢」，且「號稱一折八扣本，即定價十元的書，只售八角，以利推銷。」³²魏紹昌曾以《紅樓夢》為例，有一段相當精采的追述：

私營書商迎合讀者貪便宜的心理故意擡高標價而以廉價出售的牟利辦法，在二十年代末葉起至解放前的上海，這類書店頗多。他們刊印的大都是古典小說、民間故事等通俗讀物，不付稿費，印刷粗制濫造，所以成本低，可以賣得便宜，而且通過小商小販運到邊遠省份和窮鄉僻壤去推銷，一般市鎮上的出租書攤，出借的也都是這種書。據我所知，如新文化書社、大達圖書供應社、通俗圖書刊行社、廣益書局、錦章書局、中央書店、春明書店等等出版的《紅樓夢》，都是這種「一折八扣本」的貨色。它們的底本大都是屬於程甲本系統的石印本，不過是由書商隨便拉一個本子胡亂加以標點便付印了，所以這批《紅樓夢》的品種和數量在當時雖然占有優勢，而且有一定的市場和銷路，……。³³

《水滸傳》的出版，也是這樣的狀況。王雲五主持商務印書館時有提

³¹ 同前註，頁 265。

³² 魏紹昌，〈亞東本《紅樓夢》摭談〉，收入巴金等著，《我讀《紅樓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 月），頁 233。

³³ 同前註，頁 233-234。

及「本館是一個出版家，我們的商品，就是書籍，必得人家多讀書，我們的營業才可望發達」³⁴，王雲五致力於推廣讀書風氣，以望擴大書籍買氣；但對多數出版社而言，書籍僅是一種能夠賺取利潤的商品，唯恐稍遲一步出版，無法搶得商機，更遑論在意是否刊行一部「僅以賺錢為目的而大拆其爛汗，既對不住古人，又欺騙了讀者」³⁵的粗製濫造本。上述分析，正巧可以回應前文引掃葉山房為《大字足本評註水滸全傳》謄寫廣告詞所言「坊刻雖多，類皆效顰西施；強加標點，與書中之大旨無關」，故何以會出現「大字評註」本，或因妄用新式標點符號之故。

上文所述皆是七十回本《水滸》，至於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胡適在 1920 年發表〈《水滸傳》考證〉後，在中國陸續發現，³⁶ 遲至 1925 年後才有新式標點本問世，亦皆順應潮流，刪除掛名李卓吾的評語。百回本的首部新式標點本是 1925 年李宗侗發行、燕京印書館印刷的《百回本水滸》；後有 1934 年北平流通圖書館出版冲霄漢閣主校點的《百回水滸》³⁷。至於百二十回本，首部新式標點本當為 1929

³⁴ 王雲五演講，顧浚泉速記，〈王總經理對第一屆業務講習班學員訓辭〉，《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年 3 月），頁 482。相關論述可參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吳旻譯，〈書是一種商品嗎？——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1937）對書籍的觀念〉，收入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頁 128-142。

³⁵ 育熙，〈示眾〉，《語絲》第 4 卷第 16 期，頁 21。

³⁶ 胡適於 1929 年完稿的〈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言：1920 年撰〈《水滸傳》考證〉只用金本和坊間通行的《征四寇》，1921 年撰〈《水滸傳》後考〉時已陸續蒐集到百回本、百一十回本、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然百回本只是日本岡島璞翻刻的前二十回，百二十回本亦僅見回目及序例。1923 年，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出現，1924 年，李玄伯（宗侗）姪兒秋興在北京購得百回本。見胡適，〈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頁 101-103。

³⁷ 馬蹄疾發現該書乃就李宗侗排印《百回本水滸》改頭換面，連同序文亦竄改李宗侗〈重刊忠義水滸傳序〉而成（《水滸書錄》，頁 68）。李宗侗藏本購入時可能僅存書首四十四回的百回本，詳見笠井直美，〈李宗侗（玄伯）旧藏『忠義水滸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31 冊（1996 年 11 月），頁 33-36 及馬幼垣，〈《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社，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百二十回的水滸》，乃據涵芬樓藏楊定見序本進行排印，先收入「萬有文庫初集」的「國學基本叢書初集」³⁸，共 20 冊，後於 1932 年合訂成二冊出版。滿州國長春藝文書局及滿州帝國圖書株式會社分別於 1943、1944 年出版《忠義水滸全書》，可說都是重新排印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百二十回新式標點本。³⁹ 從明崇禎十四年金本水滸問世至蔚為流行，成為《水滸傳》定本，馬場昭佳估計在乾隆年間中期到後期；⁴⁰ 此後，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已難在書肆覓見，甚至滅絕。七十回本壟斷書肆，若從乾隆中期（約 1755）算起，至 1925 年《百回本水滸》出現，長達 170 年。

但也有部分出版社仍保留金批語，如文明書局的《水滸傳》（1927）中，金聖嘆撰的偽施耐庵序、讀法、總論、每回首末及正文中的評語，一仍其舊。⁴¹ 中華書局在影印出版《貫華堂五才子書水滸傳》（1934）時，劉復認為圈點和批語，有助於初學者理解《水滸》在文學上的好處，心思不至於全被精彩故事給吸走，且注意圈點與批語，待全書閱畢，談論也將大不相同⁴²。事隔十多年後，中華書局排印《貫華堂五

2005 年 11 月），頁 20-22。

³⁸ 「萬有文庫」分兩集發行：第一集從 1929 年 10 月至 1931 年 10 月，每六個月出書一次，計分五次出版，收錄十三種叢書。第二集分正編及大本參考書兩類：正編從 1935 年 3 月至 1937 年 3 月，每六個月出書一次，計分五次出版，收錄五種叢書；大本參考書從 1935 年 3 月至 1936 年 3 月，每六個月出書一次，計分三次出版，收錄「十通」及《佩文韻府》。「國學基本叢書」初集的小說類收錄三種：《宋人平話四種》、《水滸（百廿回本）》及《石頭記》（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第一集一千種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頁 5）；二集的小說類收錄七種：《穆天子傳》、《搜神記》、《京本通俗小說》、《大宋宣和遺事》、《西遊記》、《鏡花緣》及《儒林外史》（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頁 9）。

³⁹ 馬蹄疾，《水滸書錄》，頁 101。

⁴⁰ 馬場昭佳，《清代における『水滸伝』七十回本と征四寇故事について》，《東京大学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7 號（2004 年 4 月），頁 87。

⁴¹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頁 688。

⁴² 劉復，〈影印貫華堂原本水滸傳敘〉，〔明〕施耐庵著，金聖嘆批，《水滸傳》，臺北：三民書

才子書水滸傳》(1947)，朱文叔言：「惟影印本分冊多，閱讀容有不便；售價昂，或亦為一般購買力所不及。爰將影印本重付排印，原本優點，如眉批、圈點、雙行夾批中加斷句等，一仍其舊」⁴³，除了從冊數，價格考量外，依然肯定評語是原本優點。

然似此保留金批語之作，在 1920 年代還能透過未採新式標點的石、鉛印本，與新式標點本並存。及至新式標點本廣為流行後，陸續退出市場，漸為讀者遺忘。

三、白話文範與整理國故：派生改良本

(一) 補語體文讀本不足：「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

清末民國初《水滸傳》的石、鉛印版本數量極豐，純粹是反映讀者需求量；1919 年後，情況改觀，有個任務賦予《水滸傳》——成為白話文學的範本。1915 年國語研究會於北京成立，主張「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同年，《新青年》雜誌創刊，發起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拆牆毀壁，並高舉民主、科學兩大旗幟的「新文化運動」。1917 年 1 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第 2 卷第 5 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主張使用白話文，並獲得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支持。1918 年 1 月，《新青年》第 4 卷第 1 號實踐此主張，全部改成白話文；4 月，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1 月，國語研究會成功請願教育部頒布注音符號，黎錦熙稱此是「文學革命」和「國語統一」呈現雙潮合一。⁴⁴ 真正讓白話文達到文學革命，是搭上 1919 年由青年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致使「白話小說報，突然

局，1970 年 4 月據 1934 年中華書局版翻印，頁 2。

⁴³ 朱文叔〈附白〉，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 167。

⁴⁴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 1 月再版），頁 136。

發生至四百餘種之多」⁴⁵，無怪乎學者稱 1919 年的五四運動為解放運動時期的最高潮。⁴⁶

若要使白話文普及，必須透過學校教育予以推廣。雖然在清末已有新式教育制度問世，但對語文教育仍是使用四書五經作為教材。辛亥革命後，民國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共和國教科書》，當中的文章仍是文言文。1920 年 1 月，教育部採納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及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建議，在「全國教育界輿論趨向，又咸以國民學校國文科宜改授國語為言」，遂「茲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其收言文一致之效」⁴⁷。同年 4 月，教育部又頒布一道訓令，凡國民學校各年級，截至 1922 止，凡舊日用文言所編的教科書，一律廢止，均改為語體文。往後，語體文成為語文教育的重點。⁴⁸ 教育部公布學校教科書採用國語後，以部令修正〈國民學校令施行細則〉第四條，成為：「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並注重語法之程序。其材料，則其適應兒童心理並生活上所必需者用之。」⁴⁹ 當時的國語教科書的來源，是由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等出版社聘請專家，據此設計，且有洪北平、何仲英編纂《白話文範》（全四冊），廣蒐古今名人如程頤、程顥、朱熹、蔡元培、梁啟超、陳獨秀、胡適等人白話之作，「所選的文合於中等學校的程度，中等學校教授白話文，可以用作教本」⁵⁰，第一冊在 1920 年 5 月出版，

⁴⁵ 同前註，頁 137。

⁴⁶ 陳青之所謂「解放運動」系指「凡思想的解放，態度的變更，及人生的再造，此種種運動打成一片的運動，就叫做解放運動」。見陳青之，《中國教育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48》（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 10 月），頁 694。

⁴⁷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頁 109-110。

⁴⁸ 詳參陳青之，《中國教育史》，頁 700-703。

⁴⁹ 教育部，〈教育部令第八號〉，收入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頁 110-111。

⁵⁰ 洪北平，〈白話文範編輯大意〉，《白話文範·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 年 4 月 6 版），頁 1。

未足一年，1921年4月已至六版。

除了教科書之外，另一學習白話文的讀本，首先聯想到的是《水滸傳》一類的通俗小說。1917年，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及：

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煉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⁵¹

把我佛山人等人所作的白話小說比作世界第一流文學，並指出此等白話小說是獲得《儒林外史》等章回小說的啟發，已初步將白話文及通俗小說地位提高。後來，胡適於〈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述及創造新文學需先預備的「工具」之一，即是「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雖僅列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及《紅樓夢》⁵²，然此舉實則將整體通俗小說劃入白話文學的模範。

因此，當教育部頒令授課改採語體文後，而通俗小說又獲著名學者胡適點名加持，順其自然地被視為白話文學模範，市場上也冒出了由新文學社編輯的《白話小說文範》，該書於1920年6月出版，此時已頒定新式標點符號，但仍僅用「。」作為標點符號；兩個月之後，亞東本《水滸》才出版。《白話小說文範》序文中有言舊小說中雖不盡是白話，但當中的土語文言，人人可以領會，其好處是「一人有一人的口吻，一事有一事的線索，前前後後，照顧周到」，並能見作者構思布局經過修改商量；又進一步批評近時小說家用了許多典故，卻

⁵¹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8。原載《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

⁵²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51。原載《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

不直截了當，越纏不清，且隨手亂寫，限日成編。為提點「作者如何構思、如何立局，何等簡潔，何等痛快」，該書在每段故事後加入評語，以讓讀者將來有意模仿起來，不致畫虎不成反類犬。⁵³顯然，其用意即是期望通過書中所輯內容，作為有意寫作白話小說者的模範。該書選六部舊白話小說，計 21 則片斷故事，其中有 5 則水滸故事（《水滸傳》4 則、《蕩寇志》1 則）⁵⁴。

同年 12 月，夢花館主人江蔭香也編輯《評點歷代白話文範》，在〈編輯大意〉中云：

坊間所出的白話範本，拉拉雜雜，毫無章法。把那不是白話的，也當作了白話，胡亂的湊在一處；而且每篇並無批評，不分皂白，牛搜馬勃，並蓄兼收；只從事實上著想，長篇累牘的加入，全不把事實細細剖解指示內中的門徑，囫圇吞棗，好像看了幾節分段小說，讀了幾篇雜類文稿，與學者有什麼益處？⁵⁵

由江氏批評看來，當時的白話範本已有只錄情節（江氏稱「事實」）、不指點門徑的分段小說問世。江氏認為通俗小說可見古人已精於白話文，因此全書收 80 篇白話範本中，有 71 篇來自 11 部通俗小說，其中以節選自《水滸傳》的篇幅最大，達 16 篇。⁵⁶

⁵³ 新文學社編輯，〈編輯白話小說文範的大意〉，《白話小說文範》（上海：中華書局，1921 年 4 月 4 版），頁 1-2。

⁵⁴ 四則水滸故事為下：〈武松打虎〉、〈石遷盜甲〉、〈李逵尋母〉、〈魯達救友〉；一則來自《蕩寇志》——〈宋江被擒〉。其餘小說如下：《紅樓夢》（4 則）、《品花寶鑑》（3 則）、《儒林外史》（7 則）、《兒女英雄傳》（2 則）。

⁵⁵ 江蔭香，〈編輯大意〉，《評點歷代白話文範》（上海：廣文書局，1921 年 6 月再版），頁 2-3。

⁵⁶ 十六則水滸故事如下：〈拳打鎮關西〉、〈火燒草料場〉、〈楊志賣刀〉、〈東郭比武〉、〈黃泥岡〉、〈景陽岡〉、〈快活林〉、〈鴛鴦樓〉、〈琵琶亭〉、〈潯陽樓〉、〈沂嶺殺虎〉、〈二打祝家莊〉、〈枷打白秀英〉、〈時遷盜甲〉、〈水火二將〉、〈沒羽箭〉。其餘小說如下：《紅樓夢》（8 則）、《儒林外史》（12 則）、《三國志》（8 則）、《西遊記》（1 則）、《鏡花緣》（2 則）、《品花寶鑑》（3 則）、《官場現形記》（7 則）、《孽海花》（5 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3 則）、《老殘

令人好奇的是，《白話小說文範》及《評點歷代白話文範》為何會從這些書目選錄文範？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及〈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僅提到《水滸》、《西遊》、《紅樓》、《三國》、《儒林外史》，然二文卻引起錢玄同魚雁往返共論小說，勾引出《說岳》、《鏡花緣》、《品花寶鑑》、《七俠五義》、《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文明小史》、《恨海》、《九命奇冤》、《孽海花》等書，胡適也逐一評點。胡、錢書信分別載在《新青年》第3卷1號、4號、6號（1917年3、6、8月）及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後來一併收入1921年12月出版的《胡適文存》⁵⁷。在《胡適文存》未出版前，可能早已廣為流播，進而成為編選者的書單。胡適又發表一段極具關鍵的評語：

故鄙意以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古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趼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⁵⁸

《水》、《西》、《儒》、《紅》成為必選，李、吳作則選擇《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⁵⁹。此外，編選者可能一併斟酌諸小說於讀者群中受歡迎程度，故一併列入部分胡適評價不高的小說（如《說岳》、《孽海花》）或未提之作（如《蕩寇志》、《兒女英雄傳》）。

遊記》（6則）。採新式標點符號，每則故事後附短評。

⁵⁷ 胡適，《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22-23、頁30-34、頁42-43。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只提及我佛山人（吳趼人）、南亭亭長（李伯元）、洪都百煉生（劉鶚），未舉作品，後經錢玄同舉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而胡適又覆信釋疑。

⁵⁸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32，原載《新青年》第3卷第4號（1917年6月1日）。

⁵⁹ 胡適說吳趼人的《恨海》、《九命奇冤》是精意結構的全德小說，評價極高，卻不受編選者重視，或因接下來一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在上所舉同類之書中，獨為最上物」所致。見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31。

《白話小說文範》處於教授白話文寫作及剛頒訂新式標點的過渡期，雖沒採用新式標點，但仍在短短十個月內印刷至第四版；《評點歷代白話文範》採新式標點符號，且還細分出四十七條白話文寫作方法，1921年6月已有再版，此皆可見當時市場需求。代之而起的是亞東本《水滸》這一類刪除評語、不立文字，直接讓讀者心領神會的新式標點本。亞東本《水滸》成功地做了一項示範——結合新式標點符號及白話文範，造成其他書局有樣學樣。本來，《水滸傳》、甚或其它古籍當可藉此模式源源不絕出版，但隨後而來的「整理國故」，使之產生變數。

（二）芟國渣：「使舊書以嶄新的形式與世人見面」

胡適撰寫於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義〉中提到「我們對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並呼籲以批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理出「國粹」與「國渣」，再造文明。⁶⁰此嚴謹態度，亞東本《水滸》及〈水滸傳考證〉可說是成果，胡適主要用在文本校勘及學術研究，出版商則將目光聚焦於理出國粹與國渣，故在檢視這些白話文範之時，很快就發現：若要拿《水滸傳》作為白話文教科書，當中有許多迂腐陳舊或不堪入目的情節。正因此，市面上除了充斥各式各樣的白話文教科書之外，也開始出現為青年學子或社會大眾量身打造的改良本《水滸傳》，可區分出兩類——「原著新訂本」及「片斷故事本」。

馬蹄疾在《水滸書錄》中列有「小說・故事」一類，收錄兩種據

⁶⁰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557-558。原載《新青年》第7卷第4號（1919年12月1日）。

水滸原著加工改造的作品，⁶¹ 第一種是書名標有「水滸」，內容則是據原著刪改或縮節而成，但從中仍能看出原著從頭至尾的完整情節。第二種，馬蹄疾明確稱為「片斷」，依其所載書目，可細分出下列幾項：（一）、據原著片斷演化成的小說，如《金瓶梅詞話》。（二）、將同一人物事件以記事本末方式集結並刪削成文，如據小沙彌懷林〈水滸傳述語〉所載而著錄《清風史》及《壽張縣令黑旋風集》，這兩部作品未傳世，內容當是據原著相關情節而成。（三）、從水滸原著抽出片斷，文字基本上不做更動。這些「片斷」不再以「水滸」做為總名，且無法盡窺全豹。

本文從馬蹄疾的概念延伸，將第一種稱為「原著新訂本」，第二種命為「片斷故事本」，但略有修正。「原著新訂本」的定義是據原著刪改而成，且能看出原著從頭至尾的完整情節；「片斷故事本」在依從馬蹄疾認知之外，還納進有收錄水滸故事的小說選本。準此，《水滸書錄》中張越瑞據原著中魯達、林冲、武松及李逵等四人而成屬人物傳記式的《節編水滸傳》，或倪國培編《水滸傳節選》改列入「片斷故事本」。

前文提及亞東本《水滸》率先將金批語刪除，在當時激起不小影響；然而，除了刪去評語，有人開始對於原著中不盡理想之處，予以修改。江蔭香據金本重編成四卷共一百八十節的《水滸演義》，該書編訂之時，恰逢亞東本《水滸》出版，江蔭香曾想擱筆中止；後慮及「我是分段改良的水滸讀本，與他囫圇圖圇的水滸全傳，截然兩樣」，於是竭力完成。⁶²《水滸演義》和亞東本同樣採用新式標點，但《水滸演義》仍用石印，可是排版非常精美，線裝四冊，楷體字；其新式標點不是如同亞東本標在行右，而是與今日的新式標點一樣，化入行

⁶¹ 詳細書目見馬蹄疾，《水滸書錄》，頁379-437。

⁶² 江蔭香，〈新式水滸編訂大意〉，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381，後押日期民國九年（1920）十月十二日。

中，行距顯得疏朗。江蔭香認為金批語在今日看來「已覺得有些陳腐，沾染八股的習氣」，且「逐句評斷，更不免支離穿鑿，把一部《水滸》，弄得凌遲碎剮，反不能夠直截了當，爽爽快快的讀下去」，故「決議把一切評注，盡行除掉，免得斷斷續續，分了讀者的心」⁶³。重編的方法，除了盡行刪除評點外，尚將原著中「祝家莊」、「曾頭市」、「大名府」等大事實，隨內中角色，剖成數段，以表「各人辦事的主體和界線」，並另作標題，點明每節意思；此外，將事涉奸淫、攸關風化如「潘金蓮結識西門慶」、「潘巧雲結識海閨黎」等段，給予竄改，將實事變作表白；語多神怪（「洪太尉誤走妖魔」）及每回中浮文套語、無關重要的談論，亦節去不少。江蔭香給這部計「刪去十分之二三」、劃出一百八十節的分段改良本，賦予「添上新式標點符號，儼然是教科的白話課本」的期許。⁶⁴ 很顯然，江蔭香有受到亞東本採新式標點符號及胡適批評金批語的影響；江氏進一步將《水滸傳》中事涉奸淫、攸關風化、語多神怪、每回中浮文套語、無關重要的談論（此即江氏所謂亞東本《水滸》「囫圇吞棗」之處）等「國渣」逐一刪去或修訂，也是在呼應胡適所提出的「整理國故」，同時，大概也是首位運用「整理國故」思維有意識地將《水滸傳》分段改良。

然而，《水滸演義》後，或因各家出版社忙著將大批古籍逐一進行新式標點符號，或因將文言古籍發行「文白對照本」⁶⁵，或因急於編印學校教科書，就目前所蒐資料看來，整個 1920 年代，無人步踵江氏，對《水滸傳》進行原著新訂本，倒是片斷故事本因合於教育政策，接二連三地出版，此將於下節論述。最後，連《水滸演義》也絕

⁶³ 同前註，頁 380。

⁶⁴ 同前註，頁 381。

⁶⁵ 當時的出版業，還出版前置文言原文、後採白話翻譯兼新式標點符號的「言文對照」書籍，許嘯天整理的《聊齋誌異》即是如此，而許嘯天本人也從事多部文言古籍翻譯成白話文的工作，目的是「整理國故」。見〔清〕蒲松齡著，許嘯天整理，《聊齋誌異》（上海：群學社，1930 年 2 月 4 版），書末的廣告頁載多部許嘯天白話翻譯之作。

跡書肆，原因推測是當時書肆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水滸傳》新式標點鉛印本，而世界書局本身也有出版，加上當時江氏作法可能未普遍獲得認同，且分成一百八十節又過細，導致讀者寧願選擇《水滸傳》新式標點鉛印本。要再見到類似《水滸演義》的原著新訂本，得等到1932年教育部修正中、小學正式課程標準時，其中所擬訂國文課程綱要有言「有詮釋之名著節本及經刪節之小說」⁶⁶，出版商順藤摸瓜，結合整理國故，市面上至少有三部原著新訂本問世——胡懷琛的六十八回《水滸傳》（1933）、王憶菴（味辛）的《水滸五十回》（1935）及宋雲彬的四十八節《潔本水滸》（1935），三人全是據金本改編。

胡懷琛認為七十回本較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究竟是簡便一些，而有精彩的部分都已包括在內」，適合初讀；據此編寫成的六十八回《水滸傳》，其方式則是「除了加標點及分段而外，還略微刪節了一下」。刪節標準大致與江蔭香持相同看法，認為神怪、性慾都無助於原著，而刪除文字中遇有拖沓、重複之處，對原著亦無損壞。⁶⁷ 江蔭香在《水滸演義》中僅刪去洪太尉誤走妖魔，胡懷琛更進一步，將「驚愕夢」一筆勾除，僅到「排座次」為止；後出的王、宋二書亦是如此。胡懷琛的新訂本反而彰顯水滸英雄的俠義精神，神怪屬於超人，無法凸顯人間性的俠義。王憶菴所改訂的《水滸五十回》，其修改方式，據吳研因言：

（原著）在內容上，有不少神怪、迷信、穢褻、鄙俚以及過於兇惡殘忍之處，在文學的技術上，也有許多不重要的節目，不必要的交代，累贅無用的穿插，平淡無味的描寫等等，這在五十回是完全加已修改了。五十回本並且把所有章回小說的濫調

⁶⁶ 教育部，〈師範學校國文課程標準〉，《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7：1/2（1935年1月13日），頁32。

⁶⁷ 詳見胡懷琛，〈改編者的話〉，收入馬蹄疾，《水滸書錄》，頁398-399。

完全刪除，另依天然段落，編成章節，使舊書以嶄新的形式與世人相見。⁶⁸

至於宋雲彬四十八節《潔本水滸》的刪削標準：（一）、凡涉於神怪、穢褻、因果報應之談和一切浮詞泛語都在刪剔之列。（二）、不關緊要的故事，如「魯智深大鬧桃花村」、「魯智深火燒瓦罐寺」、「武行者夜走蜈蚣嶺」等，全都刪去。（三）、書末「驚愕夢」認為迂腐，亦刪除。但也有例外，如戴宗的神行法雖事涉神怪，但若刪除「則全部《水滸傳》便有許多地方不能連貫起來」，而宋江得天書及石碣，雖屬神怪，但這是「宋江吳用在那裡搗鬼，想藉此以欺騙其他的頭領的」，因此，均不予刪除。⁶⁹ 其中「不關緊要的故事」指的是無傷全書情節架構的支線，且目錄不再使用章回對句（胡、王二書仍用）。

總體說來，這些原著新訂本，刪除之處大致相同，逢神怪迷信、姦淫穢褻、兇惡殘忍之處，不是全數刪除，就是簡單帶過，如三書完全跳過王婆如何協助西門慶偷情潘金蓮，直接講述武松回到陽穀縣後，從鄆哥及何九叔處打探到武大死因，為兄報仇。其次，原著中的說書套語如詩詞，這在三書中均遭視為浮詞泛語，三位編訂者毫不客氣剔除乾淨；至如「卻說」、「但說」、「且說」等套語，胡書尚還保留，王、宋二書則刪削殆盡。從亞東本《水滸》到原著新訂本，真可謂徹底執行「整理國故」！

早在江蔭香作《水滸演義》，已看準《水滸傳》「現在一般新學界，都當作白話文的模範」，該書是否曾成為學校教育白話文的讀本，不得而知；胡、王、宋三人之作，何其有幸，皆成中、小學生讀物。胡作列入「小學生文庫」的長篇小說類，而吳研因盛讚王作為「一種最

⁶⁸ 吳研因，〈水滸五十回序〉，見王憶菴，《水滸五十回》（上海：兒童書局，1935年5月），頁2。

⁶⁹ 宋雲彬，〈導言〉，《潔本水滸》（上海：開明書局，1935年11月），頁9。

優良的兒童讀物」⁷⁰，二書基本上是为小學中、高年級設計。吳研因有言「近年我在教育書報上，見到幾篇兒童讀物的研究報告關於兒童閱讀興趣的測驗，兒童最喜歡閱讀的書目中，往往列入《水滸》這兩個字」⁷¹，此言確有所本，《水滸》在「高級兒童比較愛讀的讀物二十種」中，排名第九。⁷²至於宋作，書末廣告頁有言，是「作為中等學生國文科課外讀物的文藝書籍，……，把其中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逐一刪去，使它成為並不缺乏教育價值的東西」⁷³，用意昭然若揭。原著新訂本的出現，已從整理國故的層次，深入語體文教育以及兒童讀本，而出版界正是相中這塊龐大教育市場。

（三）輯精華：「給讀者一個精神時間上的救濟」

1920 年代初的整理國故運動，還牽引出「國學必讀書目」之爭。1923 年 2 月，胡適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要求所擬出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號稱「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的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書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及「文學史之部」，共計 188 種書；其中，文學史之部列入《水滸傳》等十三種小說，清一色都是白話章回小說。⁷⁴之後，胡適又應《清華周刊》記

⁷⁰ 吳研因，〈水滸五十回序〉，見王憶菴，《水滸五十回》，頁 3。

⁷¹ 同前註，頁 1。

⁷² 石順淵、張匡，〈兒童讀物的新研究〉，《教育雜誌》第 22 卷第 11 號（1930 年 11 月），頁 53。石、張乃據上中實小為調查對象，其餘通俗小說名次如下（括號中為名次）：《老殘遊記》（6）、《西遊記》（7）、《岳傳》（10）、《三國演義》（11）、《七俠五義》（12）、《小五義》（13）、《封神榜》（15）、《鏡花緣》（19）。稍早之前，儲子潤曾調查無錫中學實驗小學三四年級最喜歡的讀物，《水滸傳》亦名列其中（〈無錫中學實驗小學三四年級閱讀實驗報告〉，《教育雜誌》第 21 卷第 6 號，1929 年 6 月，頁 141）。

⁷³ 宋雲彬：《潔本水滸》，書末廣告頁。

⁷⁴ 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文存二集》，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96-97。原載 1923 年 2 月 25 日《東方雜誌》第 20 卷第 4 號。這十三部小說為《水滸傳》、《西遊記》、《三國志》、《儒林外史》、《紅樓夢》、

者要求，擬出一份「實在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從 188 種書籍中，挑出 39 種，加上一部《九種記事本末》，共得 30 種；這當中，《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及《紅樓夢》等四部小說雀屏中選。⁷⁵ 然而，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卻引起了「國學必讀書目」之爭，連梁啟超都曾擬出書單。⁷⁶ 而在一連串的國學書目當中，「梁胡所擬者，以盛名為之輔，乃不脛而走，坊間彙訂之書目，聞亦銷行巨萬」⁷⁷。

「最低國學書目」變化出多少種類的文庫、叢書出版，有待考察，至少最負盛名的是商務印書館從 1929 年 10 月規劃出版「萬有文庫初集」中收錄的「國學基本叢書初集」，王雲五有云：

本集書目，在草擬時最感困難者，莫如國學基本叢書，……，更取近人關於國學入門書目十三種作客觀的衡量，斟酌損益，至再至三，結果三百種中未見於各家入門書目者，祇十四種，此即為求各科各類之具備，而不得不補充諸家所漏列者也。⁷⁸

收書明顯參考連篇迭出的最低國學書目。商務印書館作法雖求完備，問題是，國學書目所列繁多，如何讀得完？胡適發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後，《清華周刊》記者隨即回應「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求學的時間共八年」，當中還有必讀的西文課程，之後

《水滸後傳》、《鏡花緣》、《今古奇觀》、《三俠五義》、《兒女英雄傳》、《九命奇冤》、《恨海》、《老殘遊記》。

⁷⁵ 胡適，「實在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文存二集》，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頁 99-100。

⁷⁶ 關於「國學必讀書目」的議題，詳參王存奎，〈整理國故運動中的「國學必讀書目」之爭〉，《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1 期（2010 年 2 月），頁 120-125。

⁷⁷ 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收入許嘯天編著，《國故學討論集（上）》（上海：上海書店，1991 年《民國叢書選印》影印群學社 1927 年版），頁 99。文末押日期 1925 年 12 月 30 日。

⁷⁸ 王雲五，〈印行萬有文庫第二集緣起〉，《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450。

還要留學國外，書目太多，時間太少，無論如何讀不完。⁷⁹ 1925 年底，曹聚仁面對這些國學書目時，也浩歎「即有聰慧絕倫之青年，排盡外務，竭其力以治之，月治一種，已嘆觀止，……；今欲使一般青年習此最低限度之國學，且限其在短期間，愚百思誠不得其解」⁸⁰，因此建議：

書目之編次當為全部，而採用者則不妨局於小部分——國故學書目之編成，不在使讀者之某書可讀，某書應讀；而在使讀者之治某科則讀某書知某章節，知國故中關於某科之材料有幾許。⁸¹

意即未必要覽畢全書，而是能夠擇其精華所在。就通俗小說而言，該理想早在《白話小說文範》及《評點歷代白話文範》編印時已成型，然僅是為白話文範本而節選；不過，結合二書與胡適所列的小說，共計 18 部（新增《岳傳》、《品花寶鑑》、《蕩寇志》、《孽海花》、《兒女英雄傳》），大概可視為該時期最受歡迎的通俗小說。

值得一提的是，1922 年，在面對卷帙浩繁的「最低國學書目」、憂心時間太少之前，新華書局早已慮及上海進入現代化工商業城市，市民無暇閱讀厚重的水滸原著，於是編輯《白話水滸全傳》，「撮他書中精要來成一部書。而於表現，描寫，仍不失精彩」，目的即能夠在「短時間中讀得有益書籍」⁸²，亦即在短時間內閱畢全書，並迅速了解一整部原著故事，毋需將原著從頭讀徹。該書濃縮原著，刪除細節描述，不避諱神怪內容，從楔子到驚愕夢，只留下各回重要情節梗概，

⁷⁹ 《清華周刊》記者，〈《清華周刊》記者來書〉，見胡適，《胡適文存二集》，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頁 98。文末押日期 1923 年 3 月 11 日。

⁸⁰ 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收入許嘯天編著，《國故學討論集（上）》，頁 99。

⁸¹ 同前註，頁 101-102。

⁸² 小蕪，〈序〉，見新華書局編，《白話水滸全傳》（上海：新華書局，1922 年 7 月），小序頁 1。

利用 125 頁篇幅呈現金本內容。如原著中寫楊志賣刀一段，在楊志與牛二一問一答之間，表現寶刀「砍銅剝鐵，刀口不捲」、「吹毛得過」及「殺人刀上沒有血」，直到楊志向官府出首殺了牛二，共約一千餘字；《白話水滸全傳》則濃縮成僅一百三十字不到的段落：

沒毛大蟲牛二當時見了楊志，便要買刀。又問刀的好處，楊志道：『第一削鐵如泥，第二吹毛得過，第三殺人不沾血。』牛二便叫他一件件的試。楊志把頭兩件給試了。看的人不覺喝采。牛二卻要他殺人不沾血。楊志再三推開，牛二卻要奪他的刀，並且又舉拳來打楊志。楊志大怒只一刀來把牛二殺了，楊志便同眾人去見官，自認不諱。⁸³

這完全應付都市化的青年男女們，迅速吸收《水滸傳》的情節。

胡適所點名的小說與白話文教育、整理國故、閱讀精華匯為一流，終而出現共計七集的「白話小說文選」系列，其中鄒人達選輯《水滸傳精華》（1925）共收錄二十段故事⁸⁴。該系列編纂的用意是在這新舊過度時代若要提倡活的文學，最好的工具即是白話章回小說，但這些小說裡「寫男女部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字，絕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除」，使之成為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⁸⁵。除此之外，還有如大仁書局編輯部編輯《小說故事十種》（1926）、陸衣言編校「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1926），二書均是集結片斷精華，前者收入〈武松殺嫂〉，後者收入〈蔣門神〉及〈武松殺嫂〉兩冊。

⁸³ 新華書局編，《白話水滸全傳》，頁 20。

⁸⁴ 「白話小說文選」共有七集，其餘為《三國志精華》、《蕩寇志精華》、《鏡花緣精華》、《西遊記精華》、《紅樓夢精華》、《岳傳精華》。

⁸⁵ 鄒人達，〈白話小說文選敘例〉，《水滸傳精華》（上海：文明書局，1916 年 9 月再版），頁 1-2。

許嘯天為《小說故事十種》所撰序言，可更清楚說明整理國故、閱讀精華匯為一流的出版趨勢。許氏在序言中云「舊小說都犯著一個通病，便是事欠剪裁，文有鬆懈」，並舉《水滸傳》為例，稱在十歲時讀了《水滸傳》曾有「把宋江、魯達、武松這班人，另提出來，自成首尾，編成小說故事的感想」⁸⁶，《小說故事十種》即是該理想的實現，並續言：

每一人或每一事，自成首尾；說來頭頭是道，筆筆緊湊。何等有剪裁，何等有文學趣味？這一來用披沙淘金的法子，保存了舊小說的真精神；二來，也得到舊小說的真教訓。況且在這智識競爭的時代，我們把許多時間精神銷費在舊小說無謂的鋪陳上，也很感覺到不經濟；何況那批舊小說，因為它無謂的鋪排，乏味的科白，反減少了它文學的趣味，背景的趣味與事實的趣味。因此，這整理後的《小說故事》，不但給讀者一個精神時間上的救濟，更給歷來小說者一個文學價值上的大救濟。⁸⁷

當時知識界已清楚舊小說的缺點，故這批片斷故事本的編撰用意，大概如同許嘯天所言，即閱讀精華，享受文學趣味，剪除疵處，避免浪費時間。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到創作新文學的方法時，介紹「結構方法」（剪裁、布局）與「描寫方法」（寫人、寫景、寫事、寫情），進一步提到中國文學的方法不完備，不足作為模範，而「小說好的，只不過三四部，這三四部之中，還有許多疵病」⁸⁸，一方面要以《水滸傳》等通俗小說作為白話化文範本，一方面又提醒這些範本是有疵處的。片斷故事本選擇出最優秀的片斷，加以剪裁刪削，以

⁸⁶ 許嘯天，〈小說故事序〉，見大仁書店編輯部編，《小說故事十種》（上海：大仁書店，1926年5月），頁4。

⁸⁷ 同前註。

⁸⁸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頁55。

期「給讀者一個精神時間上的救濟」，同時呼應胡適觀點。

1937 年，張越瑞那部列入「中學國文補充讀本」的《節選水滸傳》（全二冊）同樣採取該方式。張氏以百二十回本作為底本，認為「《水滸傳》創造的人物，最成功，與最能表達作者創造力的，要算魯達、林冲、武松、李逵四個」，故將關於四人的文字節選而出，作成四篇傳記；由於注意到原著中「在每一個人出台之前，總有別的人物，引他出來」的結構與寫法，「既不願改變原文的字句，又不願狗尾續貂似的給它添湊上去，所以只好在每個列傳之前，加上一個補記，說明前面的情節，中間有大段刪節處，也依法泡製」，並謙遜表示《節選水滸傳》只是提供「《水滸傳》的一種讀法」，但實則是「希望讀者讀過這個節本之後，再去看全部《水滸傳》」⁸⁹。既然以百二十回本作為底本，並節出魯達等四位人物，是否表示一併納入大聚義以後的情節？其實不然。張氏從四人在原著初登場開始節錄，迄處分別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林冲武鬪楊志、武松入夥二龍山、朱富智救李逵，這些全都是大聚義前的內容。或因張氏認為前四十五回最為精采，而大聚義後關於四人的內容過於碎裂，故在力求保持原文面貌而不願動手修改的原則下，只好捨棄四十五回後的情節。然而，礙於篇幅囿限，張氏將原著的武十回截成兩大段：第一段迄於打虎，第二段起自迭配孟州，至於二段中間在原著橫跨三回的殺嫂，全都刪去，利用約百字的「補記」做為過場。李逵故事亦是分成兩大段：第一段迄於琵琶亭宋玉蓮受驚，第二段起自李逵接母，張氏認為「這中間固然也有敘李逵的文章，但我覺得過於散漫，也不很精彩，所以刪了」⁹⁰。在諸多整理國故、閱讀精華的片斷故事本中，《節選水滸傳》是目前所見唯一一部以人物為中心之作。

⁸⁹ 張越瑞，〈導言〉，《節選水滸傳 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7 月），頁 13-14。

⁹⁰ 張越瑞，《節選水滸傳 下冊》，頁 225。

本節探討《水滸傳》因白話文範及整理國故而派生的兩種改良本的演進過程，得知最初的改良本主要基於白話文教育而生，後因整理國故加入而積極刪除國渣。然而，這批《水滸傳》改良本往往收入「小學生文庫」、「中學生文庫」、「民眾基本叢書」，或是強調作為初學者、兒童讀本，這透露出一個訊息：為學校教育所設計。

四、「略讀」：作為補充讀物的教育文庫

（一）「有詮釋之名著節本及經刪節之小說」

192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頒訂「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小學國語課程綱要中，第四學年將小說加入誦習，且初級小學的畢業最低限度標準是「讀語體的兒童文學等書八冊（以每年二冊計，每冊平均四五千字）」，高級小學為「讀兒童文學等書累計十二冊以上」⁹¹。而在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讀書」細分「精讀」跟「略讀」：

精讀選文（由教師擬定書本），詳細誦讀，研究；大半在上課時直接討論。略讀整部的名著（由教師指定數種），參用筆記，求得其大意；大半由學生自修，一部分在上課討論。⁹²

且附上胡適起草的〈略讀書目舉例〉，其中小說列 13 種，選入舊小說兩部：《西遊記》跟《三國演義》。⁹³ 高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由胡適起草，亦分精讀、略讀，兩項均暫訂閱讀八種名著為最低之數，取

⁹¹ 吳研因起草、委員會覆訂，〈小學國語課程綱要〉，收入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 10 月再版），頁 4。

⁹² 葉紹鈞起草、委員會覆訂，〈初級中學國語課程綱要〉，收入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頁 52。

⁹³ 胡適起草，〈略讀書目舉例〉，收入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頁 55。

材須「都用已經整理過的名著」，並註云「『整理過的古書』約含五個條件：（1）標點，（2）分段，（3）校勘，（4）簡明的注釋，（5）詳細的引論。古書不經這樣的整理，皆不便於學生自修」⁹⁴。胡適還列出一紙〈高級中學應讀的名著舉例〉，分成二組：組一選非韻文 22 種，須精讀 6 種，略讀 5 種；組二選韻文 5 種，須精讀 2 種，略讀 3 種；其中，非韻文列入《水滸傳》、《鏡花緣》及《儒林外史》等三部舊小說，且准許《四書》、《詩經》、韻文類用節本或選本⁹⁵。由上看來，新學制課程的國語標準綱要，對小學是要求閱讀語體文撰寫的兒童文學，沒硬性要求舊小說列入教材；到了中學，明確標舉出舊小說作為精讀或略讀的書目，且將《水滸傳》置於高級中學。

「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頒訂前，為因應授課教材改用語體文的要求，各大書商紛紛推出語體文編撰的教科書，供學校擇用。然兒童語體文讀本教材有限，於是開始有小學教員選擇中華書局在 1917 年 4 月起編輯出版的「小小說」系列，作為中級小學兒童讀本。⁹⁶「小小說」系列，不以整部書籍排印為目標，而是逐錄多部舊小說的片斷精華，單獨成冊，每冊均講一個故事，封面搭配該冊故事繪製，篇幅短小，約 30 至 40 頁（見附錄三）；此時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整理國故等文教趨勢尚未風起雲湧。1932 年 9 月，「小小說」系列結束出版，全套共計 100 冊。出版初期，置於各冊前的〈小小說例言〉以簡易文言寫成（見附錄五），由其例言可知，該系列的出版用意是將舊小說中富有趣味而無傷道德的故事，重新改竄文字，以小本精裝之型式，供作消遣品；令一方面，則是藉此理解「通文之捷徑」或「悟

⁹⁴ 胡適起草，〈高級中學公共必修的國語課程綱要〉，收入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頁 82。

⁹⁵ 同前註，頁 82-84。

⁹⁶ 儲子潤，〈無錫中學實驗小學三四年級閱讀實驗報告〉，《教育雜誌》第 21 卷第 6 號，頁 141。郁樹敏針對上海市立第一實驗小學校進行兒童興趣之調查時，其小說類亦列入「小小說」（〈小學兒童興趣之調查與研究〉，《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7 號，1932 年 7 月，頁 42）。

謀篇布局之法」，以期吸引對舊小說有興趣卻粗通文字的讀者。此時，石印本的舊小說大量出版，「小小說」可視為利用新形式開發的新商品，拓展市場，其最初出版時，商業利益可能高過語文教育。由於甫出版已帶有白話文範、整理國故的性質，故爾後能夠與文教趨勢銜接，成為中級小學兒童讀本。

1920 年代起，新式標點符號已大行其道，「小小說」仍不改本色，未使用新式標點，一直以此面貌作為白話文範。1926 年 10 月 4 版的《黃泥岡》⁹⁷，其〈小小說例言〉仍是文言文，後來目前所見 1932 年版本的〈小小說例言〉都改成白話文，且原來僅言「足為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改成「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民眾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作為國語文的補助讀物都很適宜」⁹⁸。由於能夠契合民眾舊小說消遣品以及語體文兒童讀本，銷售對象廣泛，使「小小說」系列直到 1932 年已印刷達 7 版之多，在全套未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情況之下，算是長銷商品。或許因未採用新式標點符號顯得不合時宜，且有部分書局後來居上，編印片斷故事本，致使「小小說」系列滿百冊後，結束出版。

繼「小小說」系列後的《白話小說文範》及《評點白話文範》，皆是片斷故事本，都可視為應付白話文授課的教科書。後來在整理國故、最低國學書目、「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的「略讀」方針的效應之下，又有前面諸書作為前導，於是出現了陸衣言編校的「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各自獨立一冊，當中的《女兒國》、《鬧天宮》、《老殘遊記》都在文末附上胡適的評價；或如許嘯天《小說故事十種》，十種故事匯集成一冊，甚至還有鄒人達的《水滸傳精華》，將整部小說的精華片斷集結一冊。上述五部作品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頒

⁹⁷ 收七則水滸故事〈大鬧五台山〉、〈黃泥崗〉、〈劈羅真人〉、〈火燒草料場〉、〈十字坡〉、〈鴛鴦樓〉、〈祝家庄〉；一則出自《蕩寇志》——〈旅店除奸〉。每冊定價 5 分。

⁹⁸ 中華書局編輯，〈小小說例言〉，《鴛鴦樓》（上海：中華書局，1932 年 9 月 5 版），例言頁 1。

訂前、後出版，後來可能都成為中、小學的閱讀教材。

同「小小說」形式的作品，還可見約在 192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平民小說」系列，全套共 24 種片斷故事，⁹⁹ 其中有兩冊水滸故事《武松打虎》及《賣刀盜甲》。然平民小說剛推出時的廣告詞有言：

本書節選新舊小說之精華，以興趣盎然、合於現代生活及思想者為標準。字句中則要加以註釋，並用新式標點段句，極合初識字者及小學生課外閱讀之用。¹⁰⁰

很顯然是在呼應胡適「整理過的古書的要求」，而設定閱讀對象是「初識字者及小學生課外閱讀之用」。若觀其〈平民小說編輯例言〉¹⁰¹，發現與中華書局「小小說」系列的用意相若，將不合時宜處點竄修改，只是更為強調語文教育功能，採用新式標點符號，且附有插圖及簡易註釋，更能夠吸引小學生閱讀。平民小說推出後也成為教員供給小學生的課外讀物，「高級兒童比較愛讀的讀物二十種」中，平民小說列名第八。¹⁰²

在新學制未頒訂之前，片斷故事本的用意是以白話文範本之姿進入學校教材；頒定後，除「白話文範本身份」外，還新增兩種身分——「兒童語體文讀本」及「略讀」，特別是小學第四學年有研習小說課程，因此，小學教師及出版商也將舊小說列入其中，使之轉化成兒童文學讀本。要指出的是，即使國文課程綱要沒有提出「略讀」方針，

⁹⁹ 目錄詳參金桂蓀，〈民國十六年來之民眾教育刊物〉，載《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3：48（1931 年 12 月 13 日），頁 33-35。

¹⁰⁰ 東方雜誌編輯部，〈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東方雜誌》第 23 卷第 12 號（1926 年 6 月 25 日），無頁碼。

¹⁰¹ 吳樂雲編纂，〈平民小說編輯例言〉，《潞安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國難後第一版），例言頁 1。

¹⁰² 石順淵、張匡，〈兒童讀物的新研究〉，《教育雜誌》第 22 卷第 11 號，頁 53。

光是出版商利益所趨、整理國故、白話文範，乃至於兒童語體文讀物方興未艾時，通俗小說選本成為讀本，何況在一份兒童對於課外讀物的興趣調查中，「小說類」拔得頭籌¹⁰³。上述情況，都會讓通俗小說朝向節選之路。

1929 年 9、10 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施行六年的「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旋告廢止，其中從國小到初高級的國文課程標準，皆分「精讀」與「細讀」，且皆列入授課時數。國文科略讀選材標準，小學是「利用許多補充讀物、參考書和其他兒童圖書，支配工作，指導讀法，令兒童按期概覽，再由教員分別考察，並和兒童互相討論（重在量的增加）」¹⁰⁴；初級中學為「選定整部的名著，或節選整部的名著」¹⁰⁵，高級中學則是「選讀整部的名著、名著的選本、文學的總集、有價值的雜誌、散見各書的單篇作品等」¹⁰⁶。與「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相較，初、高級中學部分進一步提出「節選」的概念，不再堅持選定整部名著略讀的規則，且已無如同胡適起草的書目舉例，但在最低畢業限度皆要求能夠略讀名著十二種；小學部分也不惶多讓，最低畢業限度，初級小學的略讀書籍須「倍於初小國教科書八冊的兒童圖書兩倍以上」，高級小學則是須「倍於高小國教科書四冊的兒童圖書三倍以上」¹⁰⁷，但至少不再規定每冊字數。後來，1932 年 10 月，教育部頒訂正式的中、小學課程標準，「略

¹⁰³ 郁樹敏，〈小學兒童興趣之調查與研究〉，《教育雜誌》，第 23 卷第 7 號，頁 43。

¹⁰⁴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教育雜誌》第 21 卷第 11 號（1929 年 11 月），頁 129。

¹⁰⁵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第二冊·初級中學之部》（上海：青雲圖書公司，1929 年 10 月），頁 7。

¹⁰⁶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第三冊·高級中學之部》（上海：青雲圖書公司，1930 年 1 月），頁 11。

¹⁰⁷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小學課程暫行標準〉，《教育雜誌》第 21 卷第 11 號，頁 131。

讀」部分雖無太大更動，但更詳細列出其取材標準，如師範學校的國語課程標準，「精讀」教材部分在第二、三年級劃入「記敘文（史傳或長篇小說節選）」，而「略讀」所規定選材標準第二條言「有詮釋之名著節本及經刪節之小說（除去不適於學生閱讀之部分）」¹⁰⁸；此外還摘除最低畢業限度，鼓勵教員引領學生課外閱讀，不再要求最低限度。也就是說，從「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頒訂後，可用節選書籍已正式成為略讀方針。

（二）夾藏在教育文庫中的《水滸傳》

或與因為節選書籍可作為補充讀物，「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頒布前的片斷故事本，益受重視，屢有再版，如《水滸傳精華》、「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於1931年已印製第3版；中華書局的「小小說」系列直到1932年仍推出新作，部分作舊印刷達7版之多，而上海商務印書館廠房於1932年1月29日遭炸毀，損失奇慘，也旋即於1933年8月又重新出版「平民小說」系列。1935年，王無咎編選的「故事一百種」，還擴及到古今歷史故事的編纂，其中編號第58冊至70冊，共計13冊收錄水滸故事。¹⁰⁹「故事一百種」封面統一，且採取新式標點符號，雖沒講述出版目的，然書中置插圖，篇幅短小（見附錄四），形式略同平民小說，只是沒有簡單註釋，顯然也是基於語文補充讀物這塊市場。「標點繪圖小說片錦十種」、「小小說」、「平民小說」乃至於後出的「故事一百種」，很適合成為小學讀物，以達到課程標準所要求的「重在量的增加」。

除了上述舊小說類的專輯外，「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頒定後，

¹⁰⁸ 教育部，〈師範學校國文課程標準〉，《教育部公報》7：1/2，頁32。

¹⁰⁹ 十三冊水滸故事依序如下：《花和尚拳打鎮關西》、《魯智深大鬧五台山》、《楊志比武》、《吳用智取生辰綱》、《武松醉打蔣門神》、《鴛鴦樓》、《火燒草料場》、《鬧江州》、《真假李逵》、《鐵牛搬娘》、《祝家莊》、《大名府》、《活捉史文恭》。

叢書、文庫陸續增生，《水滸傳》也藏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基本上可視為隨教育政策而出的產物，後來還在 1929 年獲得湖南省曾一口氣購買 84 部以成立全省地方圖書館，¹¹⁰並於 1932 年教育部曾令各縣市教育局須購置一套萬有文庫以充實地方圖書設備；¹¹¹總銷售量高達八千套。¹¹²當時雖已允許略讀書籍教材可用節選本，但萬有文庫是以成立地方圖書館為目標，且設定讀者為中學程度，該文庫之一的「國學基本叢書」中所收皆非節本，卻能夠讓中學教師選做略讀教材。

到了正式課程標準頒定後，已有腦筋靈活的出版商，利用「略讀」變化出的節本形式，從長期配合教育政策印行教科書的經驗中，結合同文教趨勢——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整理國故，針對中、小學生整合各類科目書籍，推出文庫或叢書。出版商也完全運用略讀取材標準所訂「有詮釋之名著節本及經刪節之小說」，讓收入文庫或叢書中的舊小說，以原著新訂本及片斷故事本呈現，且為求容攝更多內容，舊小說多數採用節選片斷故事的方式，《水滸傳》亦是如此。如商務印書館的「小學生文庫」，共有 45 類，總計 500 冊，執筆者高達 120 人，分三次編印——1933 年 10 月（200 冊）、12 月（150 冊）及 1934 年 2 月（150 冊），王雲五云：

本文庫的編印目的和萬有文庫相同，一方面在以整個的圖書館用書貢獻於小學校，一方面採用經濟的與適當的排印方法，俾小學校得以四五十元之代價獲得五百冊最適合兒童需要的補

¹¹⁰ 教育部，〈教育部指令第二三四八號〉，《教育部公報》1：10（1929 年 10 月），頁 67-69。

¹¹¹ 教育部，〈內政部、教育部訓令第八三二二號〉，《教育部公報》4：41/42（1932 年 10 月 23 日），頁 11。

¹¹²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1096。

充讀物，而奠立圖書館的基礎。¹¹³

從小學生文庫的銷售廣告（見附錄六）更能見王雲五是以「建立兒童圖書館」為銷售概念，讓強調成人本位的書籍市場，往下延伸到兒童圖書，並將範圍擴大為小學校圖書館、地方圖書館及家庭圖書館，¹¹⁴且相當廉價，全套 70 元，預約價 45 元，平均每冊 9 分錢；¹¹⁵此舉令人聯想到因前有萬有文庫獲得教育部彙集訂購，已讓出版商嗅得商機，著手規劃「兒童的萬有文庫」¹¹⁶。其中第四十類長篇小說，共 51 冊，由胡懷琛改編的六十八回《水滸傳》占 12 冊，長約 1300 頁。¹¹⁷小學生文庫乃領會教育部公布略讀方針所言「經刪節之小說」，將小說名著重新整理。

從 1930 年代直到 1949 年，目前也只有胡懷琛、王憶菴及宋雲彬三人所編改的原著新訂本，且僅胡氏之作有收入叢書，餘二人皆為獨立出版。胡、王、宋之作雖受整理國故影響，若非因課程正式標準有言「經刪節之小說」，恐怕不會有該形式問世。在語文教育市場中，片斷故事本較原著新訂本來得受歡迎，就出版商而言，一部《水滸傳》可以變化出更多冊數，收入叢書；就學校及家長看來，叢書收類廣博，物超所值；就學生來說，字數少、有圖片，可以吸引閱讀興趣。

目前所見較早收入水滸片斷故事的小學叢書，為中華書局在 1931 年 12 月起出版的「小學生叢書第一集」，至 1934 年 12 月，共出 60

¹¹³ 王雲五，〈輯印小學生文庫緣記〉，《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417。

¹¹⁴ 東方雜誌編輯部，〈購備小學生文庫一部立可成一兒童圖書館〉，《東方雜誌》第 30 卷第 19 期（1933 年 10 月 1 日），頁 1。

¹¹⁵ 東方雜誌編輯部，〈小學生文庫〉廣告，《東方雜誌》第 30 卷第 20 期（1933 年 10 月 16 日），頁 III-IV。

¹¹⁶ 王雲五，〈圖書與兒童〉，《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419。

¹¹⁷ 其餘古典小說為《三國演義》（12 冊，胡懷琛改編）、《西遊記》（10 冊，方明改編）、《岳傳》（8 冊，胡懷琛改編），另外八種為西方長篇小說的節譯或重述，共 9 冊。詳參商務印書館編輯：《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 10 月），頁 37-42。

冊，未分類，¹¹⁸ 僅有第 32 冊《景陽岡》是選自舊小說，閱讀對象是國小三四年級。1936 年中華書局再為小學生編印的「小朋友文庫」，共 450 冊—初級 14 類 100 冊、中級 18 類 150 冊、高級 19 類 200 冊，其中中級及高級的故事類各收一冊水滸故事《景陽岡》、《魯智深》（與〈孫行者〉合併）。「小朋友文庫」似乎是據「小學生叢書第一集」擴充，書目頗多重複，大有與商務印書館從 1935 年底推出的「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相互較勁。「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共計 600 冊（一二年級各 80 冊、三四年級各 100 冊、五六年級各 120 冊），「大部分為新編之稿，其小部分採自幼童文庫及小學生文庫」¹¹⁹，出版商極為貼心地為已購買幼童文庫及小學生文庫的消費者，統計出新刊稿數目，避免重複購買，除去兩文庫已備本，新增 389 冊；¹²⁰ 當中是否有收水滸故事，尚待調查。

至於中學叢書，1932 年國立編譯館奉教育部令，請商務印書館就萬有文庫中選取四百二十種，作為中等學校第一輯補充用書，《水滸傳》是否列入其中有待查明。1935 年，中華書局推出「初中學生文庫」（冊數不明），當中有一冊《注釋元明小說選》，收錄〈智取生辰綱〉及〈武松打虎〉兩則片斷故事，原文照錄，後附簡單註釋。1937 年，商務印書館專為中學國文科量身打造「中學國文補充讀本第一集」，該叢書明確表明是據教育部「略讀」的國文教材編選原則，其廣告（見附錄七）有言：

¹¹⁸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圖書總目（1912-1949）》（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3 月），頁 625-627。然查第 20 冊《冬》（1931 年 6 月）的版權頁載一篇「編輯大意」，第二點云「本書共計一百冊，前三十冊適合國小一二年程度；中三十冊適合國小三四年程度；後四十冊適合高小程度」。

¹¹⁹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廣告頁，見商務印書館編印，《圖書彙報》新 6 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3 月），無頁碼。

¹²⁰ 商務印書館編印，《圖書彙報》新 6 號，〈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條，頁 88。

查教育部規定初高級中學國文取材標準，原分精讀、略讀兩部。敝館有鑑於此，特按部定初高級中學國文略讀部分選用讀物之標準，編輯「中學國文補充讀本第一集」五十種，共分八大類。¹²¹

全套總計 80 冊，其中第七類「古今小品文及小說」，採章回小說者，僅有張越瑞節編的《節本水滸傳》兩冊，該書已在前文提及。

此外，關注正規學校教育之虞，別忘了還有「民眾教育」。據統計，1929 年，全中國不識字人數當為百分之八十，就中除去五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及應受義務教於之學齡兒童外，仍有二億二百餘萬人；為此，教育部於 1929 年，頒布〈民眾學校辦法大綱〉及〈「識字運動」宣傳計畫大綱〉，推廣民眾教育，以期化除文盲。¹²² 在此之前，晏陽初、陶知行等人已推廣平民教育，且成為教育思潮，教育部也於 1931 年發表金桂蓀編輯的〈民國十六年來之民眾教育刊物〉¹²³，當中有載錄世界書局的「小小說」系列第一集、商務印書館的「平民小說」系列及文明書局的「小說片錦十種」¹²⁴。後二種前文已提及，至於世界書局編印的「小小說」系列，查該書局的《圖書彙報》（出版年份不詳）中的兒童圖書類及新舊小說類，皆見載趙苕狂編輯「繪圖小小說庫」，全套三集，每集十冊（第三集只列出八冊），其中第一集有《繪圖小水滸傳》¹²⁵。該書共計十回，石印本，1924 年 7 月再版，其初版可能在 1922 至 1923 年，金桂蓀著錄的是 1929 年 8 月版本。

¹²¹ 東方雜誌編輯部，〈中學國文補充讀本〉廣告，《東方雜誌》第 34 卷第 12 期（1937 年 06 月），頁 54。

¹²² 教育部，〈第十七號訓令〉，《教育部公報》2：2（1930 年 1 月 12 日），頁 21-22。

¹²³ 金桂蓀編輯，〈民國十六年來之民眾教育刊物〉，連載於《教育部公報》3：43（1931 年 11 月 8 日）—3：48（1931 年 12 月 13 日）。

¹²⁴ 金桂蓀編輯，〈民國十六年來之民眾教育刊物〉，《教育部公報》3：46（1931 年 11 月 29 日），頁 78-79、頁 96 及《教育部公報》3：48（1931 年 12 月 13 日），頁 33-35、頁 39。

¹²⁵ 世界書局編印，《圖書彙報》，（上海：世界書局，無出版年），頁 79 及頁 93。

書首有人物繡像，內頁也安插不少圖畫，第一回開頭有言：

列位看官，請了。你們不是都聽得有《水滸》這部書麼？什麼武松打虎咧，十字坡打店咧，很是熱鬧，很是有趣。所可惜的，這部書太長了，全部看起來，很為不便。我如今特地迎合列位的意思，從這部書中選出了最有精彩、最有趣味的十件事情，做成了這部節本《水滸》。列位一段段的看下去，包管益看益有趣。¹²⁶

該書選擇魯達、林冲、楊志、宋江、李逵、祝家莊及曾頭市等故事，芟輯成書。世界、商務及文明等三書局的片斷故事系列，說明兩種現象：其一、中小學教育及民眾教育的讀本，有重疊部分，沒有一定的界線，讓出版商一箭雙鵰；其二、出版商的編印目的，不管是否具有明顯的教育商品取向（《繪圖小水滸傳》更看重的是「喜讀稗類」這塊市場，且偏向現代都市化追求效率下的迅速閱讀），因補充讀本缺乏，很容易列入教育範疇。前文提及中華書局「小小說」系列及王無咎「故事一百種」，大概都有此現象。

商務印書館推出「民眾基本叢書第一集」，也是「針對所謂平民教育而出版」¹²⁷。該叢書全套共分 16 門類，計 160 冊，其廣告（見附錄八）有云：

全書用淺顯流利的語體文。所有生字、成語、術語、史實等，都加註解。正文單字都遵照教育部令，一律附加注音符號，兼標四聲。凡是讀完識字課本和同等程度的人，採用本叢書均可

¹²⁶ 趙苕狂編著，《繪圖小水滸傳》（上海：世界書局，1924 年 7 月再版），第一回〈趙員外駕臨佛院，魯智深醉打山門〉，頁 1a。

¹²⁷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648。

自力閱讀，無師自通。不論用於都市或農村，均極合宜。¹²⁸

很顯然這是基於識字教育使用，初學者只需懂得注音符號即能無師自通，且門類中有公民休養、社會、法律、自然、衛生、實業等，可提供文史範疇以外的實用知識，故不論學校或家庭、都市或農村，皆是銷售對象。該叢書小說類共計 40 冊，全是從舊小說節選，其中有七冊是水滸故事。¹²⁹ 這些舊小說有一部分來自 1926 年起發行的「平民小說」系列，其中收錄的《武松打虎》及《賣刀盜甲》，亦出自該系列，可以說是平民小說注音版，除了標上注音符號之外，其餘形式皆同平民小說；餘下五本水滸故事或為新編。平民小說系列每冊售價 5 分，而「民眾基本叢書第一集」，不論任何種類，每冊售價 3 分，愈趨便宜，兩個月內已發行第三版。

1948 年，中華書局編印「中華文庫·民眾教育第一集」（全套冊數不詳），仍為民眾教育，收錄八部小說的節選本，每冊頁數 30 頁左右，倪國培編《水滸傳節選》佔兩冊，共收 13 則水滸故事，¹³⁰ 上冊六則，皆為魯達事蹟，從拳打鎮關西到倒拔垂楊柳。下冊八則故事，其中〈高俅踢毬〉、〈史進拜師〉、〈訪友石碣村〉、〈楊志送禮〉及〈李逵討魚〉，是其餘選本未曾選錄內容；林冲故事選〈林冲休妻〉、武松

¹²⁸ 東方雜誌編輯部，〈民眾基本叢書第一集續出第二組〉，《東方雜誌》第 34 卷第 13 期（1937 年 07 月），頁 180。

¹²⁹ 「民眾基本叢書第一集」分兩組發售：第一組小說類目錄參見商務印書館編印，《圖書彙報》新 6 號，頁 116；第二組小說目錄參見〈中學國文補充讀本〉廣告，《東方雜誌》第 34 卷第 12 期（1937 年 06 月），頁 54。七冊水滸故事如下：《拔楊殺虎》、《避雪失子》、《快活林》、《桃花村》、《燕青救主》、《賣刀盜甲》、《武松打虎》，每冊定價 3 分。

¹³⁰ 十三則水滸故事依序如下：〈酒樓鳴不平〉、〈拳打鎮關西〉、〈受戒文殊院〉、〈醉鬧五台山（一）〉、〈醉鬧五台山（二）〉、〈倒拔垂楊柳〉、〈高俅踢毬〉、〈史進拜師〉、〈林冲休妻〉、〈風雪草料場〉、〈訪友石碣村〉、〈楊志送禮〉、〈武松喝酒〉、〈李逵討魚〉。其餘小說節選本為：《三國演義節選》（2 冊）、《西遊記節選》（2 冊）、《紅樓夢節選》、《岳傳節選》、《今古奇觀節選》、《儒林外史節選》、《封神榜節選》、《兒女英雄傳節選》（以上各一冊），著錄見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圖書總目（1912-1949）》，頁 337-338。

故事選〈武松喝酒〉，也頗出人意表。該書照原文節錄，沒有注音符號及簡單註釋，且分段不佳，甚至不予分段。

從中、小學到民眾教育的叢書，《水滸傳》皆頗受重視，更要注意的是：就叢書的小說故事類而言，中、小學的補充讀物往往擴及現代小說或翻譯小說，但民眾教育的讀物卻是以舊小說為主體。這說明未進入學校受過新式教育的民眾，在識字習文的過程中，舊小說的故事顯然較具吸引力，因此，出版商略做調整，選擇民眾耳熟能詳的舊小說名著片斷。

總之，1929 年頒訂正式課程標準後，為替小學生尋覓語體文兒童讀本，以及中等學校的略讀教材准用節選整部的名著、名著選本或文學的總集，沒有硬性要求是要整部名著，故讓各式各樣的選本大行其道。這些中、小學生的補充讀本美其名是為了「補教科書之不足」，並賴以「養成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與興趣」¹³¹，實際上是看準教育這塊龐大市場，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有記載 1932 年發布中小學正式課程標準後，至 1937 年全國中小學的校數及人數¹³²，整理如下：

	全國公私立小學校		全國中等學校	
	學校所數	學生人數	學校所數	學生人數
1932	263,431	12,232,066	無記載	
1933	259,095	無記載		
1934	260,665	13,188,133		
1935	291,452	15,110,198		
1936	320,080	18,364,956		
1937	229,911	12,847,924	1,896 所	無記載

¹³¹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777。

¹³² 表格據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所載製作，頁 367、頁 399、頁 493-494、頁 553、頁 586、頁 693。1938 年，因淪陷區擴大，致使校數人數均不詳整，此後王氏已無記載。

由上表看來，小學生人數每年都超過一千兩百萬，驚人的數字代表隱含龐大商機。中等學校雖然記錄不詳，但從小學教育銜接到中等學校，可明白市場亦是不可小覷。何況，在新文化運動達到成熟時期後，約 1925 年附帶產生圖書館運動，並於 1928 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由大學院通令各國學校均設置圖書館，且每年經常費提出百分之五以上為購書費；¹³³ 1930 年，全國各省市公私立圖書館已達 2935 所。¹³⁴ 至於對二億二百萬不識字人口施行的民眾教育，未來還需要有自修教科書，長久下來，潛藏商機。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後，開始對日抗戰，同年 10 月 31 日，國民政府決議遷都重慶。八年抗戰初期，部分出版商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在香港均有設廠，書籍還能從香港印刷運入重慶販售，1941 年底日軍攻陷香港，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時期」，遷移到重慶的出版商需自行設法在困頓的環境中出版書籍，此時的《水滸傳》出版礙於資料所限，尚待考察。

五、餘論：《水滸傳》容受史的一環

鉛、石印技術滿足通俗小說市場需求，而待 1919 年起，因白話文、新式標點符號及整理國故、學校及民眾教育等議題登上時代舞台，促使《水滸傳》文本面貌趨向多元，出現前所未見的出版方式：先是採用新式標點的亞東本《水滸》刪除金批語，讓多家出版社追摹仿效；接著白話文運動發酵，成為白話文範；而學校教育納入語體文，在兒童語體文讀本不足之下，教員已率先採用片斷故事本作為閱讀教材；中小學國文課程綱要的「略讀」部分，則孳生片斷故事本及原著

¹³³ 王雲五，〈五十年來的出版趨勢〉，《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811。

¹³⁴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367。

新訂本，更徹底執行整理國故，刪汰淫褻、神怪、暴力等國渣，以適合兒童、青少年及民眾閱讀。總之，《水滸傳》隨著文教趨勢，從「通俗小說」搖身一變，轉型成為賦予語文教育的「國學經典」，各大書局爭相出版，商品性格顯露無遺。從高處來看，知識分子極力推動的文教趨勢，使出版商嗅得商機，並完全革新當時的古籍出版事業，這大概是胡適等人所始料未及。

由於書籍是一種商品，需要多樣化，不斷推陳出新，以符合各階層讀者的需求；有趣的是，原本事欠剪裁、文有鬆懈的缺點居然成為出版商作為發行片斷故事本的藉口。如此，原本已經免稿費支出的通俗小說，可濃縮單部或數部的精華集腋成裘，而單部通俗小說的片斷亦可拆散成數冊，這確實符合商品多樣選擇的需求。這些片斷故事本模式的優點，與動輒四、五百頁以上、可能還需分冊的原著新式標點本及原著新訂本相較，在於篇幅極短、不須全套翻閱即可閱讀喜愛的精華片斷，且售價便宜，即使列入叢書也能分冊銷售，對水滸故事有興趣但消費能力並不高的讀者大概能夠負擔得起。若從租書業者看來，短薄的片斷故事本確實比厚達四、五百頁的原著新式標點本或原著新訂本，來得容易流通；若就讀者心理思考，厚重之作無法一次覽畢，待下次閱讀又需付款，於是選擇此種短薄的片斷故事本，能夠一本接一本閱讀，甚為簡便。

必須說明的是，本文雖結合近代文教趨勢來看《水滸傳》的出版，但回歸到純粹提供通俗小說而非為教育設計的出版業，依舊蓬勃發展，整個 1920 年代，未採新式標點的石、鉛印本《水滸傳》，是與新式標點本並存的；且當時的演義體通俗小說充斥書肆，上海競智圖書館還曾「取宋江歷史，編述為盜始末，輯成一書，計分二十四回，都三萬餘言」¹³⁵，出版石印本《宋江歷史演義》，該書僅重新刪編原文

¹³⁵ 競智圖書館編輯，〈提要〉，《宋江歷史演義》（上海：競智圖書館，1923 年），提要頁 1。

及回目，情節不變。又有江村抽截原著片斷，改編成《花和尚》、《翠屏山》、《武松全傳》、《大名府》及《三打祝家莊》等書。《花》、《大》二書無緣一睹¹³⁶，但《翠》、《武》、《三》等三書，如同《宋江歷史演義》，只是文字幾乎沒有更動，僅新訂回目，再行出版。也有仿效當時極為流行的連環畫，截取片斷故事但刪去說書套語，每頁文字搭配圖畫，如董天野《潘巧雲畫傳》¹³⁷。上述作品並非為了中、小學或平民教育所編選的片斷故事本，而是抽出耳熟能詳的大段落，集結成冊，而且書名還取用大家耳熟能詳的京劇名目（如江村）；其優點是讓眾所周知的故事輯成一冊，讓《水滸傳》的舊雨新知者能夠立即品讀，不須檢閱或攜帶全套小說。這是為愛觀稗史小說者出版，有其市場存在。

最後，本文所論僅是《水滸傳》近代容受史中圖書類的一環，擴而充之，還可討論據其而來的故事新編，如茅盾〈豹子頭林冲〉及〈石碣〉、施蜚存〈石秀〉、陸墟《水滸二婦人》及《潘巧雲》、任倉廠《武松故事新編》、巴雷《石秀與潘巧雲》等小說；若欲深入調查水滸故事商品化的狀況，從 1920 年代於上海蔚為風行的連環畫及電影，商品性質強烈，實為最佳的分析材料。而搖擺於「狗尾續貂」及「錦上添花」之間的水滸續書的出版，皆因《水滸傳》在傳播過程中商業因素的不斷增強所造成，¹³⁸ 且據筆者觀察，石、鉛印技術傳入中國，以及胡適對《水滸傳》的研究，在坊間已刷版式微的《水滸後傳》，恭逢其盛，反攻市場。1912 年以後的水滸續書亦須全盤調查，至少吳雙熱《新水滸》¹³⁹ 及許廬父《今水滸》¹⁴⁰，皆是筆者近期所挖掘

¹³⁶ 馬蹄疾說《大名府》「本事雖參照《水滸傳》，不同之處不少」（《水滸書錄》，頁 425）。

¹³⁷ 董天野，《潘巧雲畫傳》，連載於《萬象》，收入楊周主編，《民國期刊匯編·第一輯·萬象》（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 9 月）第 1 年第 4 期（1940 年 10 月）至第 2 年 12 期（1943 年 6 月），第 2 年 10、11 期斷稿，共 36 幅圖。

¹³⁸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122-123。

¹³⁹ 吳雙熱，《新水滸》，連載於《飯後鐘》第 1 年第 11 期（1921 年 8 月 18 日）至第 2 年第 6

到從未著錄的資料。

總之，本文僅就「中國近代文教趨勢與《水滸傳》的商業出版」的議題發論，至於整構出《水滸傳》，乃至於其餘古典小說名著，在現當代的容受狀況，仍是有待開發的領域。

（責任校對：李奇鴻）

期（1922年12月28日），共發表楔子及六回，未完。

¹⁴⁰ 許廩父，《今水滸》，連載於《小說日報》，1923年211期-228期及230期-234期，229期斷稿。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施耐庵著，金聖嘆批，《水滸傳》，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4月據1934年中華書局版翻印。
- 〔清〕蒲松齡著，許嘯天整理，《聊齋誌異》，上海：群學社，1930年2月4版。
- 〔清〕鄭光祖，《一斑錄》，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9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2003年。

二、近人論著

- 大仁書店編輯部，《小說故事十種》，上海：大仁書店，1926年5月。
- 中華書局編輯，《鴛鴦樓》，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5月初版。
-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中華書局圖書總目（1912-1949）》，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3月。
- 王旭川，《中國小說續書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5月。
- 王清源、牟仁隆、韓錫鐸編纂，《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4月。
-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3月。
- 王憶菴改寫，《水滸五十回》，上海：兒童書局，1935年5月。
- 世界書局編印，《圖書彙報》，上海：世界書局，無出版年。
-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11月。
- 石順淵、張匡，〈兒童讀物的新研究〉，《教育雜誌》第22卷第11號，1930年11月，頁52-57。
- 全國教育聯合會新學制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新學制課程標準綱

- 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10月再版。
- 江東茂記書局編，《江東茂記書局圖書目錄》，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1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9月。
- 江蔭香編輯，《評點歷代白話文範》，上海：廣文書局，1921年6月再版。
- 吳樂雲編纂，《潞安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國難後第一版。
-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上海：學林出版社，2006年2月。
- 宋雲彬改寫，《潔本水滸》，上海：開明書局，1935年11月。
- 育熙，〈示眾〉，《語絲》第4卷第16期，1928年4月16日，頁21-28。
- 金桂蓀編輯，〈民國十六年來之民眾教育刊物〉，連載於《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3：43（1931年11月8日）—3：48（1931年12月13日）。
- 阿英，《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
- 洪北平編選，《白話文範·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年4月6版。
-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實業印書館，1934年1月。
- 胡適，《胡適文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
-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
- 范慕韓主編，《中國印刷近代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年11月。
- 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 馬幼垣，《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年11月。
- 馬蹄疾，《水滸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

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第一集一千種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

商務印書館編印，《萬有文庫第二集目錄》，上海：商務印書館，無出版年。

掃葉山房主人，《掃葉山房書目》，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2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9月。

張越瑞節選，《節選水滸傳（上）（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7月。

教育部，〈教育部令第八號〉，收入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頁110-111。

教育部，〈教育部指令第二三四八號〉，《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1：10，1929年10月，頁67-69，頁67-69。

教育部，〈教育部訓令第十七號〉，《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2：2，1930年1月12日，頁21-22。

教育部，〈內政部、教育部訓令第八三二二號〉，《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4：41/42，1932年10月23日，頁11。

教育部，〈師範學校國文課程標準〉，《教育部公報》（政府公報資訊網：<http://gaz.ncl.edu.tw/allJID.jsp>）7：1/2，1935年1月13日，頁29-39。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國文〉，《教育雜誌》第21卷第11號，1929年11月，頁129-131。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第二冊・初級中學之部》，上海：青雲圖書公司，1929年10月。

- 教育部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編訂，《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第三冊・高級中學之部》，上海：青雲圖書公司，1930年1月。
- 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收入許嘯天編著，《國故學討論集（上）》，上海：上海書店據群學社1927年版影印，1991年12月，頁83-102。
-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收入《民國叢書・第一編・48》，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10月。
- 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309-338。
- 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
- 新文學社編輯，《白話小說文範》，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4月4版。
- 新華書局編，《白話水滸傳》，上海：新華書局，1922年7月。
- 董天野編繪，《潘巧雲畫傳》，連載於《萬象》，收入楊周主編，《民國期刊匯編・第一輯・萬象》，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9月，第1年第4期（1940年10月）至第2年12期（1943年6月）。
- 鄒人達選輯，《水滸傳精華》，上海：文明書局，1916年9月再版。
- 鄒振環，〈土山灣印書館與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發展〉，收入上海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
- 趙苕狂編輯，《繪圖小水滸傳》，上海：世界書局，1924年7月再版。
- 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月再版。
- 儲子潤，〈無錫中學實驗小學三四年級閱讀實驗報告〉，《教育雜誌》第21卷第6號，1929年6月。

韓琦，〈從澳門、香港到上海—19 世紀中葉西方活字印刷技術在中國的傳播〉，收入上海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2 月。

韓琦、王揚宗，〈石印術的傳入與興衰〉，收入《中國印刷史料選輯》第 4 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 年 9 月。

韓琦，〈晚清西方印刷術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以石印術的傳入為例〉，收入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2 月。

魏紹昌，〈亞東本《紅樓夢》摭談〉，收入巴金等著，《我讀《紅樓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1 月。

競智圖書館編輯，《宋江歷史演義》，上海：競智圖書館，1923 年。

〔日〕上田望編，〈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版本目錄（稿）〉，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 4 號，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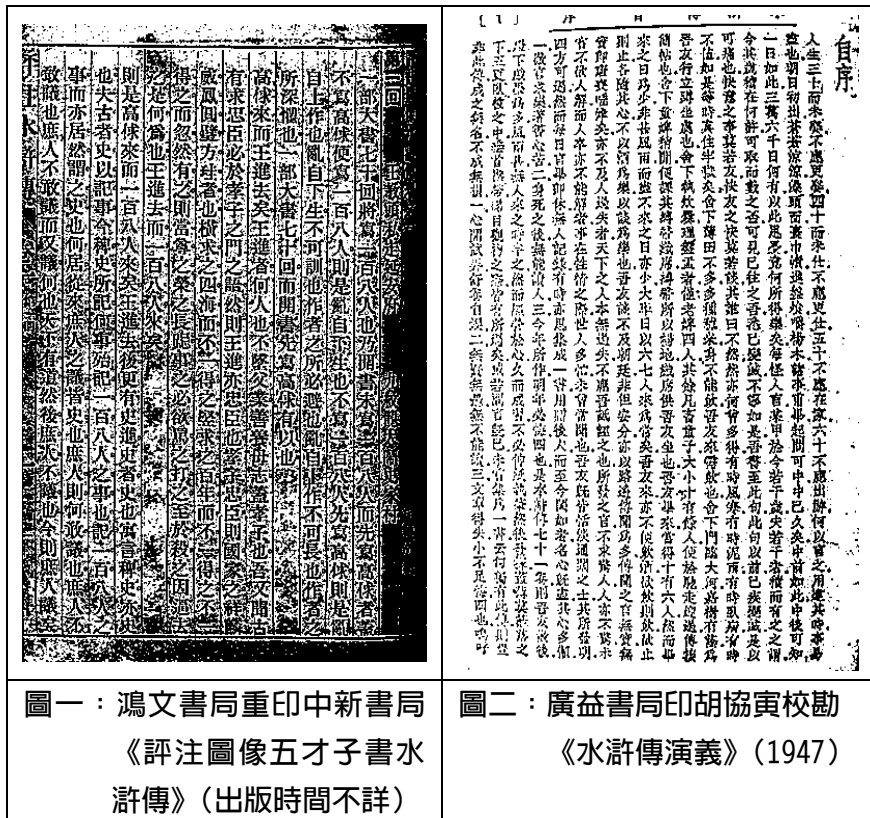
〔日〕氏岡真士，〈《征四寇》溯源〉，載《人文科学論集・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編》第 46 號，2012 年 3 月。

〔日〕馬場昭佳，〈清代における『水滸伝』七十回本と征四寇故事について〉，載《東京大学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第 7 號，2004 年 4 月。

〔日〕笠井直美，〈李宗侗（玄伯）旧蔵『忠義水滸傳』〉，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31 冊，1996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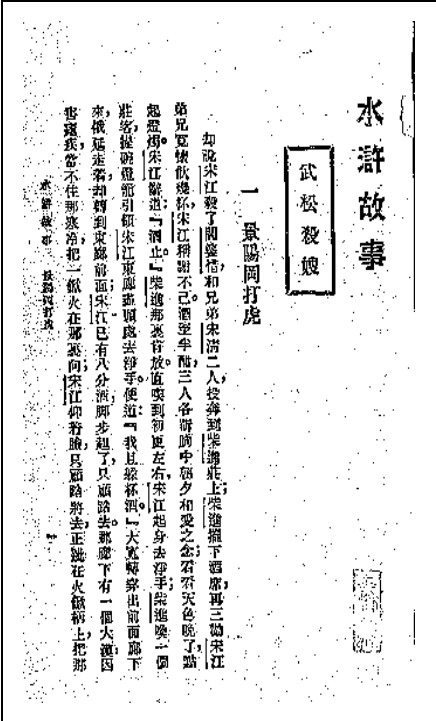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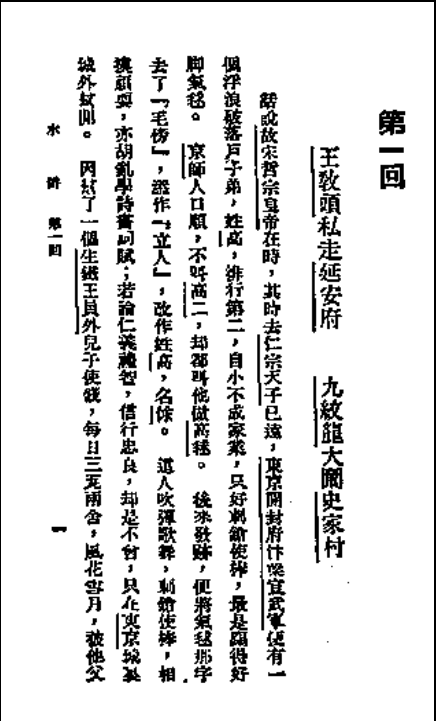
〔法〕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吳旻譯，〈書是一種商品嗎？——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1937）對書籍的觀念〉，收入韓琦、米蓋拉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12 月。

附錄一：四種鉛印本排版形式



圖一：鴻文書局重印中新書局
《評注圖像五才子書水
滸傳》（出版時間不詳）

圖二：廣益書局印胡協寅校勘
《水滸傳演義》（1947）

 <p>水滸故事</p> <p>武松殺嫂</p> <p>一 景陽岡打虎</p> <p>話說宋江殺了閻婆惜，和兄弟宋清二人投奔到柴進莊上。柴進這莊上，舊時三箇宋江弟兄，寬懷飲酒，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斟酒中，朝夕和受之。看官先見了，聽起聲，宋江說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喚到初更左右，宋江起身去洗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兩盞燈，引宋江東廊廡裏去洗手。便道：「我且歇杯酒。」大驚轉走出前廊下，來，候候走來，却到東廊廡前，宋江已有八分酒，腳步起，只顧路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這我，當不住那裏，把一盞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路去。正洗在火爐上，把那</p>	 <p>第一回</p> <p>王敦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p> <p>話說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什梁宜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舊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顯得好腳氣。京師人口順，不呼高二，却都叫他做高衙內。後來發跡，便將氣氣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曾，只在東京城裏城外紮個。因惹了一個生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p>
圖三：取自《小說故事十種》 (1926)，上海大仁書店	圖四：汪源放句讀《水滸》 (1948，15 版)，亞東圖書館

附錄二：《大字足本評註水滸全傳》廣告

（原載掃葉山房主人：《掃葉山房書目》，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23冊，頁265。）

評註水滸全傳

全書精訂十二冊二函

水滸為吾國說部之傑作。向列四大奇書之一。因其描寫人情物態。纖悉畢肖。有如鑄鼎。燦爛。使百八人之聲。音笑貌。千百年後。活現紙上。雖屬小說家言。不啻讀史。公之遊俠列傳。故能膾炙人口。流傳不絕。近自提倡白話文字。此書價值益增。然坊刻雖多。類皆中。之。大旨。無。關。而。板。本。之。精。善。者。特。覺。希。見。本。號。有。鑑。於。此。特。經。大。字。精。本。增。繪。圖。像。兼。加。評。註。與。前。出。之。三。國。紅。樓。同。一。精。美。書。已。出。版。購。者。從。速。

定價 連史紙 四元六角

有光紙 二元六角

掃葉山房圖書

附錄三：中華書局「小小說」系列之《劈羅真人》封面及首頁



附錄四：王無咎編選「故事一百種」之《真假李逵》
封面及首頁



附錄五：〈小小說例言〉

（全六條，出處：《鴛鴦樓》，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5月）

- 一、本書文字淺顯，材料活潑，名曰「小小說」。凡已通文字者，固可取以消遣；即略解字義者，亦可藉為通文之捷徑，足為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之補助品。
- 二、本書材料皆本諸舊小說，取其富有興趣而無傷道德者，並於每種封面繪成彩圖，鮮明悅目，尤足助人興味。
- 三、舊小說向為社會所歡迎，惟事實之間凡有傷風化者，本書概為刪去文字；之間或有原文太深及俚俗者，本書概加改竄，俾閱者易於領悟，免涉歧邪。
- 四、本書每敘一段故事，只述本事之事實，繁文駢語概從刪改，文字分段另行排列，尤易醒目。起首結尾，前後相應，平常觀覽，可悟謀篇布局之法，虛字用法，習見純熟，自易貫通。
- 五、本書用三號字排印，行款舒朗，絕無蠅頭小楷，字跡模糊，致傷目力之弊。小本精裝，尤便攜帶。
- 六、舟車勞頓，閨閣清閒，手此一卷，誠為絕妙之消遣品。

附錄六：〈購備小學生文庫一部立可成一兒童圖書館〉廣告

（原載《東方雜誌》第30卷第19期，1933年10月1日，頁1）



購備小學生文庫一部 立可成一兒童圖書館

小學校

為實施自動教育起見，必不可缺少各科補充讀物，取用不竭。國內大學專科及中等學校已各有圖書館，小學校之設有圖書館者，數目尚少，而其需要日益迫切。二十二年度，是普通設立兒童圖書館的年頭了！因為已經有了適當的整個的兒童圖書館用書。

地方圖書館

向來以成人為本位，而忽略了兒童。近年來雖已有少數地方圖書館增設兒童圖書部，但距普通的情形尚遠。小學生文庫，應此需要而編印，只需備本文庫一部，另闢閱書室一間，便可立成一所兒童圖書館。

家庭

之有相當圖書設備者，為數甚多，但亦不免偏重於成人方面，以致在公餘課餘，父兄有書可讀，而子弟任其荒廢。故真能愛其子女者，應多備兒童讀物，使子女於不知不覺之間，養成自力修學之習慣。小學生文庫自為最合宜之設備。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五百冊，括有門類四十五，凡圖畫、科學、社會、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藝術、語文、文學、史地、地方、而無不該備。依照本國兒童的需要，為適當的支配。

目錄	出書	售價	管理	形式	內容
第一集五百冊，括有門類四十五，凡圖畫、科學、社會、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藝術、語文、文學、史地、地方、而無不該備。依照本國兒童的需要，為適當的支配。	十月底先出二百冊，十二月底及廿三年二月底各出一百五十冊。	第一集定價七十元，預約四十五元，平均每冊僅費幾分錢；另有三次分交辦法，尤為便利，十月底截止。	書面上依類各印一號碼，可由兒童自己管理，無須有專員主持。	六開版式，收齊劃一。印刷精美，圖畫豐富，全書合裝一箱，佔地無多。	第一集五百冊，括有門類四十五，凡圖畫、科學、社會、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藝術、語文、文學、史地、地方、而無不該備。依照本國兒童的需要，為適當的支配。

編主：趙應徐 五雲王

館書印務商
行發

第一集五百冊，括有門類四十五，凡圖畫、科學、社會、自然、科學、應用技術、藝術、語文、文學、史地、地方、而無不該備。依照本國兒童的需要，為適當的支配。

*1930.22:9

附錄七：〈中學國文補充讀本第一集〉廣告截頁
（頁下半為目錄）

（原載《東方雜誌》第34卷第12期，1937年06月，
頁54）

編主岫寄張 音獻丁 五雲王

第一集 五十種

中學國文

國文為各學科之重要工具，而中學又為學習國文最重要之時期。中學科目繁多，國文授課時間有限，為養成學生閱讀能力計，不能不於正課外，另覓補充讀物。查教育部規定初高級中學國文取材標準，原分精讀略讀兩部。敝館有鑒於此，特按部定初高級中學國文略讀部分選用讀物之標準，編輯中學國文補充讀本第一集五十種，共分八大類。編制上最大之目標，在予學生自動閱讀之便利：（一）所選材料，或屬整部原書，或為短篇著作，或自整部中取其最重要之篇段，均以適合中學生之實際需要，及其閱讀能力為主。（二）卷端另撰導言，書內酌加註釋，略示讀書途徑，以引起讀者研究之興趣。

附錄八：〈民衆基本叢書第一集第二組〉廣告截頁
(頁下半爲目錄)

(原載《東方雜誌》第34卷第13期，1937年07月，
頁180)

物讀統系衆民給供 動運書讀衆民進推

民衆基本

呂金錄主編 編輯者五十餘人

本叢書依照下列三大目標而編成：(一)

引起民衆的讀書興趣，(二)供給實用智識，(三)使民衆可以無師自通。

第一集一百六十冊，內容計分讀書指南、公民修養、社會、法律、語文、自然、衛生、實業、歌謠、諺語、詩歌、劇本、遊戲、寓言、故事、小說、傳記、史地等十六門類。材料的支配，於智識興趣，雙方兼顧。全書用淺顯流利的語體文。所有生字、成語、術語、史實等，都加注解。正文單字，遵照教育部令，一律附加注音符號，並標四聲。凡是讀完識字課本和同等程度的人，採用本叢書，均可自力閱讀，無師自通。不論用於都市或農村均極合宜。除第一組八十冊前已出版外，茲續出第二組八十冊。全集至此出齊，具有完整系統。特價發售，更期普及。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rends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水滸傳 (1919-1949)

Lian-qian Guo^{*}

Abstract

The market for Chinese fiction rose when techniques of lead and stone printing were prominent, and until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ose techniques were able to satisfy popular demand. From 1919, however, various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rends such as vernacular writing, new punctuation practices, reassessments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combined to cause newly published editions of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水滸傳 to become more diverse in appearance and format. First of all, the Asia East edition of the text, which would come to be imitated by several other publishers, utilized new methods of punctuation and eliminated Jin's critical remarks. With the rise of the vernacular writing movement, this version of the work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l of vernacular writing, especially in schools. Since vernacular writing textbooks for children were insufficient, teachers used fragments from story books as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Selected readings from earlier novels were added to the Chinese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which spurred the production of literary samplers and new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s.

^{*} Ph. 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in turn led to a thorough reassessment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and prompted the removal of obscenities and references to spirits, devils and violence from the stories in order to make them mo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teenag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short, as a result of thes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rends, *Outlaws of the Marsh* was transformed in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from a work of “popular fiction” to a “classic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Publishers competed to put out new editions of the text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Key words: *Outlaws of the Marsh* 水滸傳, the vernacular writing movement, reassessments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educational policy, publication culture